

红旗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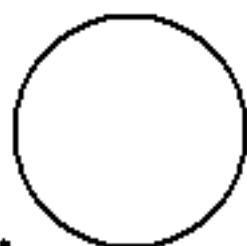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一年第十四期 ★

目 录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

领导方法 杜 敬 張先嘯 (1)

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增加市場供应 ... 季 龙 (9)

听书漫笔 王朝聞 (15)

論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吳 江 (23)

美国种族关系上的“良好记录” 陈 原 (33)

形式邏輯研究什么？怎样研究？ 吳家國 (36)

关于形式邏輯对象和作用問題的討論 (43)



•
•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杜 敬 張 先 疇

关于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毛澤东同志根据我們党的丰富的实践經驗，概括为如下的一段話：“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屬正确的领导，必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說，将群众的意見（分散的无系統的意見）集中起来（經過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众中去作宣傳解釋，化为群众的意見，使群众坚持下去，見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驗这些意見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①

这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見的方法，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是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相对立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它是我們党在各个时期中坚持运用的方法。当前我們党已經在全国处于执政党地位，毫無疑問，必須繼續运用这种方法来从事一切工作。

路线造成极为便利的条件。过去，反动統治阶级控制着国家政权，掌握着反动军队、警察等等镇压人民的工具，利用种种办法限制和剝夺人民群众的自由。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在革命根据地这部分地区我們党可以不受限制地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以外，在反动統治的地区，我們党不得不冲破重重障碍，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工作。我們党的許多优秀党员和革命群众，为此曾遭受敌人的监禁、拷打，甚至流尽了他們最后的一滴血。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情况根本改变了。反动統治的国家机器，已經被彻底打碎。人民共和国已經成立，政府和人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人民政权的各項制度，都是保障和便利人民群众享受各种民主权利的。党的政策一經制訂，就可以通过各級政府、党的各級組織、各种群众团体，通过报纸、刊物、广播等各种工具，用各种方式向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傳，提高群众的觉悟，使他們在党的领导下自觉自願地行动起来，为实现党的政策

执政党的地位为我們在工作中运用群众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問題》。《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01頁。



而斗争。这种条件使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大大地加强了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

但是，由于我们党处于全国执政党的地位，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有些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在他们看来，在过去的困难环境下，必须执行群众路线，而在新的条件下，似乎用一种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就可以完成任务，不必再作艰苦的群众工作了。同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等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还会从各个方面向我们党侵袭，并在一部分意志不坚定、作风不健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到寄生的场所。甚至可能有极少数品质恶劣的人，滥用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滥用群众对党的信任，站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做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在我们党处于全国执政党的地位以后，对于我们某些党员来说，脱离群众的危险性不是比过去减少了，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警惕。

我们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当前我们党的任务，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利用今天的联系群众的一切便利条件，十分注意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性，更好地发扬党的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遵照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指示，坚决地、彻底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二

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首先要求我们的同志必须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①。这是坚持群众路线的起码条件。

我们党的一切正确的政策、措施、领导意见，都是根据群众的意志和要求，根据客观实际情况提出的，都是符合群众的利益和群众的觉悟程度的。而群众的意志和要求是什么，群众的觉悟现在达到了什么水平，客观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做什么和怎样做才符合群众的利益，只有深入于群众之中，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得到真正的确切的了解。解决任何问题的正确办法，都不是坐在屋子里空想，或者只凭道听途说的一点零碎片断的消息，就能找到的。主观任意地想出来的办法，只能是盲目的，不切实际的，不符合群众利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我们党所一贯反对的，是群众所不需要的。

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广大党员和干部，和群众同生死共命运，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正因为这样，我们党才能够经常地、深切地了解群众的心情，正确地、具体地了解客观实际情况，定出切合群众需要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6页。



的政策和措施。这是我們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建立了全国政权的时候，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就已經要求全党同志提高警惕，决不要因为胜利而驕傲起来，决不要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而不願再过艰苦的生活。我們的同志如果沾染上这些不正确的情緒，就会障碍他們深入到群众中去，就会脫离群众。毛澤东同志早在全国胜利的前夕指出：“中国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偉大，更艰苦。这一点現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务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風。”^①

我們已經取得的革命和建設的胜利是巨大的，我們的事業在不断前进，然而我們永远不能为已有的成績而自滿。任何成績都是群众創造的。領導者只有深入于群众之中，充分依靠群众，虛心向群众学习，不断总结群众的經驗，才能领导群众前进，因而沒有任何理由驕傲自滿。群众对党愈信任，愈景仰，对党愈寄予偉大的希望，就要求我們黨員和干部愈加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切实深入于群众之中，恭恭敬敬地做群众的小学生。这样我們才能从群众当中学到更多的知識，才能领导得更正确，为群众办更多的好事，领导群众取得更大的成績，而不辜负群众的信任和希望。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必須付出巨大的努力，进行艰苦的工作。因此，貪享受，图安逸，不願同群众一起过艰苦的生活，不願到群众中去做艰苦的工作的情緒，必須防止。如果有些人产生了这种情緒，就

必須坚决糾正。

干部要真正深入于群众之中，必須时时刻刻想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員，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分子。任何人不論职位有多高，都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群众中出现，用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决不許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气。这样，群众才会感到干部是他們自己人，是他們的知心朋友，他們才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讲出自己心里的話。如果干部沒有坚强的群众观点，沒有做人民群众的勤务員的决心，沒有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而自认为比群众高一等，那末，即使同群众接触，仍然会“高踞于群众之上”，而不能做到真正“深入于群众之中”。

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这是我們党对每个黨員的根本要求。剝削階級卑視人民群众，把社会上的人們分为貴賤尊卑的不同等級，把人民群众当作牛馬，当作牟利的工具。我們黨員和干部是同人民群众站在同等地位的。我們党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党相反，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我們党一貫地教育黨員，要不断地同剝削階級的那种旧观念的殘余进行斗争，彻底清除其影响，更自觉地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做人民群众的勤务員。在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干部对群众愈尊重，愈能用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群众的主人翁感就会愈强。群众的主人翁感愈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屆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會議上的报告》。《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440頁。



强，就愈能主动地出主意、想办法，同干部一起把工作做得更好。这样，领导工作中的“从群众中来”，就有了更好的基础。

三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一切正确的领导意见，各项正确的政策、措施、计划和方案，没有不是来自群众的实践经验的。离开了群众的实践经验，就必然陷于主观主义的错误，就不可能有任何正确的领导。

任何领导机关制订的政策、措施、计划、方案，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领导机关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在物质生产部门中，要生产产品，必须有原料。有多少原料，就可以生产多少产品；有好的原料，就可以生产好的产品。领导机关在制订政策、措施、计划或方案的时候，也是如此。群众的意见和经验好比是原料或者是半成品，领导机关好比是加工工厂，政策、措施、计划、方案等就是加工工厂生产的产品。领导机关必须“从群众中来”；根据群众的意志和要求，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进行分析研究，进行加工制作，然后才能订出恰当的政策、措施、计划或方案。集中起来的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愈丰富，或者说集中起来的原料和半成品愈充足，领导机关制订出的政策、措施、计划或方案就愈正确，愈能符合实际、符合群众的需要。

思想是客观实际的反映，这是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观点。不用说凭空想出来的东西

决不可能符合实际，就是只看到一点，只搜集到群众中一些片面的意见和零散的经验，就贪图便宜地、不加分析地借以制订政策、措施、计划或方案，也不是尊重唯物主义的态度。

群众的意见，群众的经验，往往是比较分散的，不系统的，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但是，决不能因此而贬低群众的智慧，否认群众的伟大创造力。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①毛泽东同志这里说的是文艺，但是它的道理适合于一切观念形态的领域。任何领导者如果不从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这个唯一源泉中吸取营养，就不可能形成任何正确的领导意见。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把群众分散的、不系统的、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意见和经验集中起来，综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②，使它成为集中的、系统的、有条理的意见和经验。这个过程，也就是领导者发挥加工工厂作用的过程。我们必须认识这样一个真理：任何领导者在把群众的分散的、不系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2页。

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0页。



統的意見和經驗集中起來，加工成為集中的、系統的、有條理的意見和經驗的時候，除了運用群眾提供的原料和半成品以外，決不能把自己任何主觀主義的空想附加進去，否則，他就不是唯物主義者。

要認真地搜集群眾的意見，必須深入實際、深入群眾，進行細緻的調查，而不能只靠在辦公室里聽匯報、看報告。聽匯報、看報告是需要的，但是，只靠這個，是不能得到對實際情況的真正具體的了解的，更不用說對所聽的匯報、所看的報告進行認真的審查了。“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對於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①只有按照毛澤東同志指出的辦法，經常有計劃地進行這樣的調查，我們才能獲得對於實際情況的正確的了解，才能真正集中群眾的意見。而且，領導者的親身調查，能夠造成一種實事求是、大興調查研究的風氣，還能夠在調查方法上給一般同志，特別是缺乏工作經驗的比較年輕的同志（他們在我們的各個工作部門中占多數）做出榜樣，使他們學會怎樣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來進行調查研究工作。

當然，我們在向群眾進行調查，聽取群眾意見的時候，應該置身於群眾之中，虛心向群眾學習。群眾的智慧和經驗是最豐富的，群眾的創造力是最偉大的。毛澤東同志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

起碼的知識。”^②毛澤東同志就是我們虛心向群眾學習的榜樣，他說：“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③我們只有像毛澤東同志那樣具有謙虛謹慎的態度，群眾才願意同我們坐在一起討論問題，研究問題。否則，我們就會聽不到群眾心裡的意見，即使下去調查了，也會得不到對真實情況的了解。

四

群眾的利益，群眾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客觀標準。因此，經過調查研究，根據從群眾中來的東西所制訂的一切政策、措施、計劃、方案等等，再到群眾中去實行的時候，還必須接受群眾的檢驗，接受實踐的檢驗，才能證明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

在到群眾中去的过程中，凡是被群眾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東西，都要堅持；凡是被群眾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東西，不符合群眾要求、不切合實際的東西，都必須堅決修正。這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態度，這是真正對人民群眾負責的態度。毛澤東同志說：“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④毛澤東同志又說：“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

①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89頁。

② 同上書，第790頁。

③ 同上書，第791頁。

④ 《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6頁。



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負責。”^①这就告訴我們，判断正确和錯誤的唯一标准，是合乎还是不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如果某一个领导机关提出的政策、措施等等有了缺点或錯誤，就必须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評，勇于改正；在自己觉察到了某种缺点錯誤时，就应当主动地、誠懇地向群众作自我批評，主动地加以改正。这样，群众就会亲切地感到这个领导机关是代表群众利益的，是对群众严肃負責的，他們也就能够更信任这个领导机关。相反地，如果有了缺点或錯誤的时候，不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首先考虑领导干部个人的“荣誉”、“威信”，計較个人得失，因而遮掩搪塞，不去正視，不认真改正，他們就会損害群众的利益，丧失群众对他們的信任。

我們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的結果，都是对成績和缺点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結果。要繼續取得胜利，就必须繼續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单位所提出的某項办法或措施，經過实践的考驗已經证明不符合群众的要求，不符合实际情况，仍然不改正，还要繼續推行，那就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不是对人民負責的态度。我們是为人民服务的，我們必須像刘少奇同志所說的那样，“要善于为人民服务，要服务得很好，而不要服务得很坏。因此，我們在人民面前，一切都不应采取輕率态度，而应采取严肃的負責的态度。”^②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而提出的政策、措施等等，即使是完全正确的，在拿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时候，也必须同群众商量，启发群众的自觉，使政策的实行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当群众还没有这种自觉的时候，我們就要耐心地等待，繼續向他們做工作。以为在“集中起来”的时候，要听群众的意見，在“坚持下去”的时候，就不要再听群众的意見了，只要按照领导者的意見办事就行了，这种看法是完全錯誤的。毛澤东同志告訴我們，进行工作要遵守两条原則，“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願”^③。把群众的意見和要求集中起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見，这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领导机关形成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以后，还要有比較恰当的方法告訴群众，引导群众自願地行动起来，这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我們必須了解，即使我們提出的政策确实符合群众的需要，但是如果群众还没有这种觉悟，还没有决心，还不自願来实行这种政策，任何领导机关都没有权利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强制群众执行。否则，好事情也会办坏。

有一些政策和任务是上級领导机关提出的，要下級去执行。在这里就有一个对上級負責和对群众負責的問題。由于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对上級领导

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們的方針》。《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128頁。

② 《論党》，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4版，第46頁。

③ 《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战线》。《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11頁。



机关負責同对群众負責是一致的。凡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就是对党有利的事情，就必须坚决地去做。凡对人民不利的事情，就是对党不利的事情，就必须反对，必须避免。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每个党员对人民負責，就是对党、对上級負責；对人民不負責，就是对党、对上級最不負責。我們必須把对党、对上級負責和对人民負責这两者完全一致起来，而不要对立起来。但是，要在执行政策、完成任务的实际效果上达到这种一致，必須經過深入細致的工作过程。因为，上級领导机关提出的政策和任务，是集中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加以系統化、条理化了的东西，必須經過深入的宣傳解釋，才能使群众理解它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并为群众自願接受。而且群众当中总是有觉悟得比較快的和觉悟得比較慢的，对于后者則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如果认为上級领导机关提出的政策和任务既然是代表群众的利益的，就可以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执行，那是錯誤的。同样，如果因为群众还不願意实行上級提出的正确的政策，需要耐心等待，因而根本不向群众做工作，以致使正确的政策不能实行，那当然也是錯誤的。这两种做法，从不同的方面把对上級领导机关負責同对群众負責割裂开来，其結果既不能对党負責，也不能对群众負責。

在不同地区、不同具体情况下，需要有不同的具体措施，才能正确地执行政策，圓滿地完成任务。因此，对于上級领导机关所提出的正确的政策和任务，也必須充分地同群众商量，根据群众的意見定出适合于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具体措施，决不当简单从

事。如果认为上級已經把政策和任务規定好了，我們就可以不动脑子了，可以不进行艰苦的工作了，那是不会有好的效果的。

在执行上級领导机关的政策或任务的时候，如果实践证明某項具体政策或具体任务不符合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不符合实际情况，就应当以对党和对群众負責的态度，向上級反映，要求上級修改該項政策或任务。上級机关必須傾听下級組織的意見，認真处理，并且按照党章的規定切实保障党员干部和下級組織在这个問題上所享有的权利。

我們党员和干部对党負責，对上級领导机关負責，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对群众負責，为了群众的利益。“必須对人民群众負責，才算是尽了最后与最大的責任。”^①如果明明知道上級提出的某項政策或任务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自己也不反映，馬虎敷衍，勉强执行，那就是对人民群众沒有負起責任，也就是对党、对上級领导机关沒有負起責任。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要經過艰苦、复杂、深入、細致的工作；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仍然需要进行艰苦、复杂、深入、細致的工作。这样才是完整的群众路綫，才能把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

五

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方法，我們就可能获得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認識，就可

^① 刘少奇：《論党》，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4版，第46頁。



能制訂出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计划、方案，就可能对工作实行正确的领导。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客观过程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全被人们所认识；同时，客观过程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认识如果不随之发展变化，思想就会落后于客观实际。因此，“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能只是简单的一个过程，而必须是反复循环，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这就是说，我们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意见的工作，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进行加工制作的工作，将系统化的意见拿回到群众中去考查检验的工作，都不能只进行一次就引为满足，而必须循环反复、不断地进行。不仅制訂总的政策、方针和整体的计划、方案，需要多次反复地坚持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就是制訂具体的政策、措施和局部的计划、方案，也需要若干次这样的反复；不仅认识重大的客观规律需要多次这样的反复，就是认识具体工作的规律性也需要若干次这样的反复。而每一次集中起来，每一次坚持下去，就会使我们对客观情况的认识一步一步地深化，从而使我们的政策、措施、计划、方案不断地得到新的补充、修正和发展，使它们更符合外界的客观世界，使我们的领导经验一次比一次更丰富，更正确。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紧密地依靠群众，在实践中努力学习，认识和掌握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规律，因而取得了两次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党继续坚持群众路线，

继续在实践中努力学习，我们也已经学到了许多东西，增长了許多知識，积累了許多經驗，这是我們今后进行建設工作的巨大財富。但是，要彻底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我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东西要学。这就要求我們要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总结群众在实践中的經驗，向群众虚心学习。我們必須像毛澤东同志告訴我們的那樣：“我們必須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学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①要做到这一点，我們又必須像毛澤东同志告訴我們的那樣，“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②只要我們不断地向实践学习，不断地向群众学习，进一步提高我們执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在一切工作中都认真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我們就可以进一步掌握社会主义建設的客观规律，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任务。

① 《論人民民主专政》。《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485頁。

②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5頁。



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 增加市場供应

· 季 龙 ·

日用小商品同人民日常生活的关系极为密切, 举凡衣、食、住、行, 从物质生活到文化生活, 都离不开日用小商品。日用小商品是由手工业和輕工业部門生产的, 其中主要是由手工业部門生产, 它的品种繁多, 行业复杂。就品种來說, 从簡單細小的发卡鞋眼, 鎖針刀剪, 到鍋碗瓢勺, 桌椅板櫈, 衣帽鞋袜, 等等, 其中有很多是享有声誉的傳統名牌产品, 丰富多采, 数以万計。生产日用小商品的行业, 主要有日用小五金、日用小百貨、炊事用具、日用家俱、竹藤棕草編織、服装鞋帽、文教体育用品、工艺美术品、日用陶瓷、日用杂品、修理服务, 等等。日用小商品生产的經營也很灵活, 既有成批生产, 也有零活加工、翻新补旧; 既有固定工厂, 也有串街串乡、流动服务。由于日用小商品生产具有这些特点, 就能够适应广大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多样的需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們对日用小商品的需要, 不仅在数量上越来越多, 而且对品种、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这就要求迅速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 增加市場供应, 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

目前, 各地都根据日用小商品生产的

特点, 从有利生产、方便群众出发, 对广大人民的需要和生产日用小商品企业的情况, 进行深入系統的調查研究, 认真总结已有經驗, 这对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有着重要意义。

充分发挥傳統生产力量, 具体安排日用小商品生产的供产銷关系。

我們国家的經濟是計劃經濟, 日用小商品生产也必須有計劃, 在整个国民經济中, 对于日用小商品的供产銷要做到統籌兼顧、合理安排。日用小商品虽小, 但不可缺少, 如果忽视了对它的生产安排, 就会給人民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因此, 在整个国民經济計劃中, 必須有日用小商品的“戶头”。只要安排得当, 工作細致具体, 日用小商品生产就会得到很快的发展; 否則, 某些品种就有被挤掉的可能。当然, 日用小商品生产的計劃, 不可能同大工业生产的計劃一样, 它需要更多地強調地方的积极性, 还要給企业有安排生产的灵活性。根据中央和地方相結合的原則, 实行按行业、按产品分級管理, 做到上下左右密切协作, 責任分明。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管理的計劃产品, 只能是主要产品, 不



能統得过多过死。

做好日用小商品生产的全面规划、合理安排，在当前必须以傳統产区、傳統产品为重点。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傳統名牌产品和出口产品，需要在全国范围或省、市、自治区范围内进行重点安排，发挥傳統产区的生产基地作用，用傳統的合理的生产方法，制造历来为群众所欢迎的傳統产品，注意保持和发扬这些产品的特色，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增加数量，增加品种。同时，把合理的傳統的供銷关系适当地固定下来，采取傳統的合理的經營方式，有计划地組織各地自由訂貨，以适应傳統市場的需要。在重点安排傳統产区、傳統产品的同时，要适当地发挥一般产区和新兴产区的作用。对于近几年来建立的一些日用小商品生产基地，凡是产品合乎规格质量要求的，也应该很好地安排生产，积极发挥它們的作用。除了现有的生产力量以外，各地还可以根据需求和可能，建立一批新的生产基地，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供应。

保证日用小商品生产稳定增长的一条重要措施，就是把生产单位、生产人員、产品品种、原料材料供应以及协作关系固定下来。各地行之有效的經驗是：县以上各級管理的計划产品，技术比較复杂的重点产品、傳統名牌产品和出口产品，要坚决定住，把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人員长期稳定下来，固定原料材料供应和协作关系。上述产品以外的日用小商品，凡是人民生活和市场普遍需要的，一般都要通过这类办法，适当地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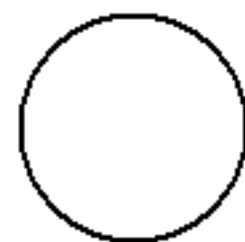
定下来。有关多种經營、季节性生产以及其他不宜定死的产品和企业，可以采取一业为主或几业为主、多业为輔的办法，或者以生产日用小商品为主、兼营其他方面服务的办法，分别进行具体安排。

正确对待生产日用小商品企业的所有制，充实和加强日用小商品的生产力量。

生产日用小商品企业的所有制，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应该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以集体所有制为主，同时允許必要的社会主义經濟领导下的个体經營。

毫无疑问，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需要有一部分机械化程度較高、适宜于較大規模集中生产的国营工厂作为骨干。但是，日用小商品的品种繁多，国营工业生产的只能是其中一部分技术性較高的主要品种，絕大部分日用小商品更适合于由手工业合作組織和人民公社工业生产。因此，从事日用小商品生产的国营工业，一方面，应当“安于小、精于小”，集中力量把承担的主要产品搞好；另一方面，要积极帮助手工业合作組織和人民公社工业提高技术，改进設備，培养技术力量。

集体所有制，在目前和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內，对于大多数手工业來說，它能很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手工业工人的觉悟程度，因而，手工业合作組織和人民公社工业是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的主要力量。它們小而分散，經營灵活，产品多样，可以充分利用地方資源，适应地方需求，所



需的技术、設備也較简单。为了适应群众多种多样的需要，在安排日用小商品生产的时候，应该重视并且加强各种手工业生产組織，充实手工业生产的基本队伍。在充实和加强日用小商品生产队伍的时候，应该重视技术力量的培养。各地采取的发挥能工巧匠的积极性，組織老手带新手，熟手带生手，提倡师傅带徒弟，提倡尊师爱徒等培养接班人的办法，应当加以推广。同时，还要有计划地安排青年徒工学艺。鼓励手工业工人带自己的子女进厂进社学艺。允許个体手工业者自己收徒弟。

某些适宜于由个体手工业者經營的修理服务业和零星产品，也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应当允許他們在手工业合作組織或人民公社的领导下进行独立劳动，自产自銷，或者流动修理，串街串乡，方便群众。

城乡家庭手工业，对于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的补充作用也不可忽視。城乡居民所使用的日用小商品，不少是由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特别是某些零星、細小的日用小商品，由家庭手工业来生产最为适宜。它們承担一部分日用小商品生产任务，既經濟方便，有利于挖掘人力、物力的潜力，增加生产，增加市場供应，增加家庭手工业者的收入，又可以使生产日用小商品企业的力量，更多地集中在比較主要产品的生产方面。家庭手工业，可以自产自銷；可以由商业部門加工訂貨；可以由人民公社或者手工业联社，組織手工业供銷生产社或生产小組，統一領導，分散生产，发原料，收成品，支付

工繳費。

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除了极少数产品适宜于集中生产需要較大的規模以外，一般說来，規模适宜于小一些，分散一些，不宜过大。这样，才有利于生产，方便群众。

改进工资制度，保证职工的合理收入。

随着日用小商品生产的发展，职工收入应该有相应的增长。我們既要教育职工群众認識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也要坚决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則。在評定职工工资的时候，应该根据技术繁簡、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的不同，評定合理的工资等級，保证技艺高的职工有較高的工资待遇。对年老体弱的老师傅，要适当加以照顾。师傅带徒弟，要給师傅一定的教学津貼，带得好的还可以給予奖励。农村中学徒的待遇，应当不低于当地同等农业劳动力的收入。

生产日用小商品企业的工资，应当采取不同的形式。凡是任务比較固定，分工比較明确，便于按成品、按工序計算产量的，可以采取个人計件或者小組計件工资制。凡是产品零星复杂、生产变化性大，或者工序之間协作性强，难以按件計酬的，可以采取計时加奖励的工资制度。无论采用哪种工资形式，都要貫徹“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則。实行計件工资的，要特別注意产品质量和劳动定額問題，防止单纯追求数量，忽視质量的傾向。实行計时工资的，要特別注意做好奖励工作，可以采取单项奖和綜合奖相



結合的办法。

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工人和人民公社工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必須同企业的生产水平和社会工资水平相适应。在城市，可以大体相当于当地同工种、同等技术条件的国营工厂工人的工资水平，现在工资水平偏低的，要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在农村，可以按照历史习惯，高于当地农民收入的水平。至于生产日用小商品企业职工福利待遇，更要根据企业的生产发展水平和经营好坏来决定。企业办得好的，福利可以多一些；企业办得差的，福利应当少一些。

日用小商品所需的原料材料极为复杂，必須根据国家分配和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解决原料材料的供应问题。

根据各地的经验，在解决原料材料供应问题的时候，一般是根据各种产品所需原料材料的不同情况和当地的具体条件，把加强国家统一分配的計劃性同发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积极性结合起来，通过主管部门同地区相结合、并以地区为主的办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多方面开辟原料材料的来源。

日用小商品生产所需的原料材料，有一小部分需要纳入計劃由国家统一分配。这些原料材料，主要是鋼材、有色金属和某些化工原料，虽然需要不多，但是缺了不可，如果在計劃中稍加平衡，就可以解决很大问题。例如，一吨鋼絲可以做三百多万根縫衣針，一吨鋁可以电鍍七千多万把民用剪刀。

日用小商品生产所需的原料材料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需要依靠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建立和发展原料材料基地来解决。大工厂的边角下料和社会廢棄物資，是日用小商品生产的原料材料的重要来源。这些原料材料，除了某些廢品要由国家统一分配以外，其余都应优先用于日用小商品生产和修补行业。在利用大工厂的边角下料方面，某些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采取了同大工厂建立固定协作关系的办法，解决了原料材料的供应问题。某些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和修理服务点，按照传统习惯，接受来料加工和带料修理，回收某些廢品自用等办法，也应当加以提倡。

生产日用小商品企业所需的属于第三类物資的原料材料，商业部門经营的由商业部門负责供应。但是，这类原料材料的品种很多，不可能完全由商业部門来供应，需要由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自行收购一部分。特别是某些日用小商品所需的特殊原料材料，如硬杂木、小杂竹、玉石、鱗皮、馬尾、犀牛毛、蚌壳等，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可以直接到产地自购自用。

适应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应当广开生产門路，增加花色品种，改进产品质量。

利用“土”原料，生产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土”产品，是我国手工业劳动者长期积累起来的一条宝贵经验。例如，利用葫芦做水瓢，利用高粱秆編鍋盖，利用柳条編水斗，等



等。发展这些“土”产品，既可以就地取材，又经济适用。这些“土”产品，是我国群众首先是农村群众所习惯使用的。以多种原料生产同类产品，既经济，又丰富多采。采用机器生产同手工业生产相结合的办法，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从多方面安排生产，开辟货源，对于增加日用小商品的品种、数量，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我国历史上某些日用小商品生产具有制造、销售、修配相结合的特点，在不影响商业部门统一安排和市場管理的前提下，适当开展生产日用小商品企业的自产自销业务，提倡前门设店、后门设厂的傳統经营方式，使产销直接见面。这样，就有利于加强生产部门和广大群众的联系，有利于改善经营管理和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品质量，有利于鼓励生产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人民群众对于日用小商品的要求，不仅是数量多，花色品种多，而且要经久耐用。所以，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不仅要注意增加数量、品种，而且要更多地注意提高质量。为了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应该明确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尽可能地制订产品质量标准，并且采用群众检查和专人检查相结合的产品检验制度，坚持和提倡包退、包换、包修的傳統做法。对于一些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声誉的傳統名牌产品，更要注意保持、继承和发扬这些产品的固有特色，精益求精。傳統名牌产品，其所以能够流传久远，以至远近驰名，是因为那些生产单位和名工巧匠集中了多年来群众的智慧，并經

过无数次創造和改进的结果。这些产品一般具有质地优良、式样美观、独具风格、经久耐用的特点，一向为群众所欢迎，生产这些产品的技艺人员也永远为群众所尊敬。至于工艺美术品，更是我国手工业丰富多采的花丛中一簇鲜艳夺目的花朵。很多精致美观、瑰丽动人、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的工艺美术品，既是实用品，又是艺术品；既有经济价值，又有艺术价值。它同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保护、发展和提高的方针指导下，广大技艺人员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創造出许多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工艺美术品。这些工艺美术品，在美化人民生活、增加出口和促进国际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必须在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中，继续进行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根据需求和可能，有计划地试制新产品，在试制成功的基础上进行生产，以适应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

民主办企业、勤俭办企业，是办好生产日用小商品企业的根本方针。

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要根据这一方针，来努力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建立和健全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一般说来，生产日用小商品的国营工厂和合作工厂，是生产日用小商品企业的骨干，应该有一套比较健全



的規章制度。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小组和人民公社工业的規章制度，要更多地注意簡便易行。为了有计划地安排生产，企业应当根据自己的生产特点和經營管理水平，依靠群众，制訂年度、季度和月度生产計劃。农村手工业、公社工业要适应农村特点，注意农业生产的季节性，除了某些必須常年生产的以外，都要实行亦工亦农，农闲多办，农忙少办或不办的方針。城市公社工业要适应这些企业以家庭妇女为主要成員的特点，对参加公社工业的家庭妇女，要注意工作時間不要过长，有些可以領料回家生产的，应当让她们領料回家生产。修理服务业的管理制度，要更多地从便利群众出发，營業時間要适应顾客要求，交貨時間要尽可能地縮短，修理的质量要有保证，价格要公平合理。

一切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都要貫徹执行群众路綫，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办好企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要充分发揚原有的民主办社的优良作风，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各項民主管理制度，民主选举理事会、监事会，生产計劃、供銷安排、組織調整、收益分配等一切重大問題，都要經過社員大会或者社員代表大会討論決定。人民公社工业要认真总结自己的經驗，同时充分吸收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好的經驗，加强民主管理。从事日用小商品生产的国营工厂，也要結合本身特点，扩大民主管理范围。这样，才能充分地發揮广大职工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办好企业。

一切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要严格实行經濟核算，加强财务管理，厉行节约，发揚因陋就簡、精打細算的优良傳統。为了防止和克服劳动力浪费和生产中无人負責的現象，企业还要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力求减少脱离生产的管理人員，合理地組織劳动力。为了合理使用原料材料，必須建立和健全原料材料收发保管和合理配料制度，制定原料材料消耗定額，充分利用廢品、廢料和代用原料，防止原料材料丢失、霉烂和大材小用、优材劣用等浪费現象，并且力争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少用料、多出貨。此外，企业还要合理地使用資金，认真控制一切非生产性的开支。

为了更好地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一切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必須在各級党委的领导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干部和工人，进一步树立一切从国家和人民需要出发的思想，正确認識到我們社会主义国家中，尽管社会分工不同，但是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建設社会主义，同样都是光荣的、崇高的工作，决没有什么高低貴賤之分。从事日用小商品生产的企业不能棄小就大，見異思迁。作雨伞的、作鈕扣的、修鍋的、补碗的等等百行百业的职工，都要充分認識到日用小商品生产是一項青春常在的事业，安心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满腔热情地去增产日用小商品，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听书漫笔

王朝闻

理的演说，正如轻音乐不轻松，漫画不滑稽，工艺美术不美观，动机是好的，可惜效果和动机难免吵架了。

说唱艺术的娱乐性，不只表现在嘴上，也表现在说、表、弹、唱、做等各个方面。不论那一方面的欣赏，都需要发挥它的娱乐性。满足娱乐要求和发挥教育作用，都要依靠调动听众想像，启发听众思索。完全不动脑筋的曲艺欣赏是不可思议的；怎样适当地让听众开动脑筋，使他们和演员一同“创造”形象，得到了欣赏的满足，从而接受思想上的影响，是曲艺的技巧高低的重要标志。

说唱，特别是评书，塑造形象的主要长处是细致入微，唯妙唯肖。不如此不能满足听书（而不是读小说）的要求。细致入微不只是为了生动地再现生活，也为了更有思想的力量。评书《林海雪原》描写杨子荣的马看见老虎时的各种反应，如果不是描写得有声有色的，那么，杨子荣打虎的故事就不那么动人吧！打虎的故事，例如几种打法，如果只有一些粗略的线索，也不能引起更大的感动。但是，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它究竟是一种艺术，不应当和生活本身没有区别。包括语言在内，不能不避免噜嗦。“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是对于诗的要求，也是对于评弹

艺术作品能不能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要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要看作品的内容是不是切合人民的利益，一方面要看它的形式合不合人民的审美兴趣。作品是不是民族化群众化，关系它能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曲艺对听众起娱乐作用，同时又是一种教育工具。曲艺的教育作用，和满足娱乐的要求不冲突。它的好处是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曲艺运用形象的有趣的形式，诱导人们体会其中的思想内容，作为教育工具，不采用枯燥的说理的形式。曲艺有它的特殊规律，可是就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而论，它也包含着不只是对于曲艺家才有借鉴意义的一般的艺术规律。

曲艺的教育作用是广泛的。具有重大主题包含着革命的思想内容的作品，它的教育意义自不必说。就以不包含什么深刻思想的某些噱头来说，由于它表现了人民的智慧、才能、创造性，应当说也是有教育作用的。

问题在于怎样发挥教育作用。听众来听曲艺，首先为了娱乐，不是到娱乐场中来听教训。把教育解释为教训，把相声变成讲道



的要求。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效果上看来，从听众的感受而不是从段子本身看来，唯妙唯肖，细致入微和洗炼、明快、单纯、含蓄的要求可以统一。张效生说杨子荣的马，怎样在雪地上踏出与非雪地不同的蹄声，细致极了；但是用语那么干净利落，不至令人感到腻味。语言和动作的堆集，不是评弹所要求的丰富和充实。真正的丰富和充实，不能只从表现形式本身来考虑，也要从它在听众中所形成的效果来考察。张效生说常遇春要座下的马跃过围墙，只抓住马的几根鬃毛，让它感到疼痛，服从指挥。在这儿利用了评弹的自由，作了如下的比喻：马鬃像人的头发一样，大把抓住不疼，只抓几根就疼极了。这样的比喻，已经够细致了吧？但它的力量在于能够让听众联想到人的生活经验。不能引起听众运用想像，从而好像进入了更大的生活境界的语言和动作的模仿，都不是艺术所需要的丰富和充实，因为它是没有多大力量的。

在群众中长期受到考验而成长起来的这种艺术样式，当它反映生活，例如塑造人物的时候，为了形成形象的真实感，方式多种多样。有时是实写，有时是虚写。虚实相生，变化无穷。曲艺的形象必须具体，可是在方式上，有时不过分着力模仿角色的具体动作，以细致入微、淋漓尽致见长的评书，也讲究含蓄。为了具体描写人物的行动，有时说书人只依靠头和视线的倾向稍稍一点醒，听书人也就想像到此时此地角色在行动中的具体表现。描写角色面对可惊的事物，不一定模仿其惊恐的状态，只是在适当的时机，用一

种从容的专注的有时甚至可以說是沉吟的神气，吸引听众关心演员所介绍的生活，诱导听者发挥想像，深入体会角色的心情，让听众自然而然地接受作品的思想。曲艺，就怎样运用有限的说、表、弹、唱、做，使形象较之生活本身更集中，更有概括性这一点而论，它和诗有共同点。

虚虚实实的表现形式，是拥有丰富经验的曲艺演员懂得听众的审美能力的表现。在《闹江州》里，林红玉描写鲁莽的李逵，常常是像善于给孩子们讲故事的人那样，低言细语。包括李逵向酒家要酒和张顺斗口在内，唱和做都不作兴简单地表面地模仿李逵的外形而大喊大叫。这种力求神似而不满足于形似的演唱，巧妙地表现了李逵的神情。又如，在相声《文章会》里，演员描写一个湖和湖中的一座山，用了两个看来显得轻而易举却也巧妙的手势。表演者在说湖的同时，把双手向中间一围，给人们带来了湖的形象。这种仿佛抽象的手势，不见得比笨拙的如实描写逊色。有些不信任听众的审美能力，也忽视艺术的集中性和表现力的演唱者，在一段唱词中描写几个人物同场的时候，一会儿面朝左，一会儿面朝右，老在台上转换位置，其结果不是丰富了形象，加强了表现力，而是表现形式的简单化。不是扩大了艺术的境界，而是缩小了艺术的境界。拉长了听众与作品之间的距离，演出吃力，听众也感到吃力，节目的鼓动作用就被削弱了。

不仅听评弹才有想像以至思索的心理活动，就是在日常生活里，人们只听见上半句话就猜出了下半句话，不只因为听话的人有



敏捷的感受能力，而且因为听话的人在迅速地进行猜测。当孩子们高兴地谈论一些有趣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不都是大说大笑的；有时仿佛唯恐趣味会受惊吓而溜走，故意低声讲述。听者不大容易听见，也就更想要听得一清二楚，一点不漏。在这儿，我感到有经验的说书人，有时故意用小声说表的技巧的现实根据。在艺术欣赏里，有了欣赏者的关心、注意以至想像活动，有限的形象才能使人感到它是饱满和丰富的。苏轼认为：“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没有欣赏者的“合作”，意味深长的语言很难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传统的曲艺运用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语言，有些是貌似肯定，实系否定的。正如寓庄子谐、俗中见雅那样，貌似肯定、实系否定的语言形式，其妙处在于能够引起思索，加强了说唱的娱乐性，也加强了内容的说服力。相声行家侯宝林介绍相声的手法之一的“道反”，也是为了给听者造成怀疑，不信任，然后由听者自己解除了怀疑，从而取得更深的信任。评弹《探监救兄》里的狱卒，其实并不精明，犯人和来访者调换了他也不明白。可是他吹牛，说自己十分精明，有“苍蝇飞过能辨雌雄”的大话。这种朴实的技巧也具备和“道反”相同的性质。引起思索也是发挥曲艺娱乐作用的手段。怎样引起思索要靠表演者的技巧。

演员常说，表演要避免“瘟”和“火”。这也是从欣赏者的审美要求出发的。“瘟”的对立面不是“火”，而是认真，有表现力，“坑”得住人。“火”的对立面不是“瘟”，而是游刃

有余，似不经心而又丝丝入扣。“瘟”和“火”其实和真实反映现实的要求不一致。这一问题所以重要，不仅关系形象的真实感，而且关系对听众的影响。听众不欢迎“瘟”的表演，也不欢迎“火”的表演。有人认为说书人应当忘记自己是说书人，最好像戏剧演员那样进入角色，这种想法未必正确。那怕是戏剧演员，要是完全忘了台下的观众，毫不意识到自己同时是演员，表演容易“瘟”。曲艺演唱者首先是处于第三者的叙述者，而不首先是书中的角色，不是书中的事变的参与者，必须防止表演的“火”气。“火”气很盛的表演，其实是还没有深刻认识描写对象、胸中无数、抓不住要点的表现。这种表演，妨碍听众的想像活动，因而和“瘟”一样，结果都不适应群众的审美要求，影响表演应得的教育效果。比如说，处处用手势、表情以至身姿来给词句的含义作翻译的不留余地的表演，好像卖劲，可是不能确切地把词句的含意翻译过来，更不逗人喜爱的是，它妨碍听众深入体会词句所包含的深刻内容。根据自己的欣赏经验，面对着评弹或其他艺术，感到不是一种简单的接受，而是有所体会的。欣赏的乐趣在于接受，也在于发现。如果艺术家只把生活现象简单地转交给听众，而不争取调动听众的想像，“参加”到形象的“创造”中来，那么，不论你在台上笑得多么起劲，哭得多么难受，说真的，听众可能除了在理智上承认你是在卖劲之外，情感是激动不起来的。

通俗易懂是一切曲艺的特色。口头文学的评弹，和供人阅读的诗歌、寓言、小说的区别之一，是前者不是个人手中的书本。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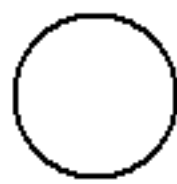
讀快讀慢，可以自由支配。后者是多数人在公共場所里共同欣賞的对象，說唱按着一定的速度进行，听众不便于反复吟咏，所以，說唱的詞句力求通俗易懂。为什么曲艺必須說得“伸展”，唱得“伸展”，做得“伸展”，也包含易懂的要求。但它既是一种文艺作品，单說詞句，不能是乏味的水詞，仍然力求其有味道，經得起吟咏。曲艺的說表，不論時間多么短暫，也必須是可供吟咏的。所謂吟咏，其实也就是一种运用想像的心理活动。在評彈段子《梨園》里的高力士，向唐明皇报告楊妃突然来到，說：“启禀陛下，大事不好！”唐明皇說：“何事惊慌？大不了兵临城下”。高力士說：“兵临城下还没有这样危險！”这是噱头。只看見这儿句易懂的引文而不听評彈，也会感到可笑的吧？但是，为什么我們会感到这样的對話可笑呢？能不能說，完全没有自己的吟咏以至思索的心理活动在起作用呢？

高尔基給小說《卡巴耶夫》的作者富曼諾夫的信上說：你“写得不經濟，話太冗长，有很多的重复，还有很多的說明。这些說明是您对自己和讀者的智慧不信任的明显标志。”評书不是小說，沒有較之小說更多穿插和鋪叙是不动听的。而且既然有評，說明式的話語总少不了。但是，包括說明式的話語在內，也必須是洗炼、明快、單純和含蓄的，不然也不动听。前几年我在南京听当代評书老将王少堂的《武松醉打蔣門神》，觉得連說明式的語言在內，也不是枯燥无味的，而是符合高尔基对小說所要求的艺术性語言。他說明蔣門神为什么不懂得躺在地上的武松使用的

拳术“醉八仙”是一个备战的架势，同时又說明他为什么能从武松此刻瞄他一眼的那种灵活的眼光，发现了武松装醉的破綻。这些說明，不只是一种說明。从效果看，它以蔣門神的心理活动为重点，其实是矛盾冲突的一种变形的描写，它关系着人物性格和斗争的发展，所以听起来一点不觉得噜囂。至于蔣門神印象中的武松那种灵活的眼神，究竟是怎样灵活的样子，信任听众的王少堂却省略了，有待听书人加以想像。

強調欣賞者的想像活动，不是忽視艺术必須是生活真实的反映这一原則。恰恰相反，正因为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又能喚起欣賞者相应的想像，讓他們联系着更廣闊的生活，更便于認識生活的內涵意义。只有真实的形象，才能够調动听众相应的想像活动。形象所直接反映的内容总是有限的；只有能够調动听众相应的想像的形象，听众才能够在感受上丰富它。說书人信任听众，把他們当成知音，运用高明的技巧，塑造活生生的形象，从而启发听众，喚起想像，听众感到亲切，才乐于接受鼓动。

我国傳統的說唱艺术，好处之一，在于一个人的表演可以把听众带进人数众多，行动复杂的廣闊境界。集中化精炼化不是艺术落后的表现，而是人民拥有丰富的智慧和卓越才能的表现。四川金錢板《秀才过沟》，是靠一个人表演的节目，具备上述优点。这段金錢板的主题，是諷刺本本主义的知識分子，一切行动都要在本本上找根据。正要到人家作客，不明白怎样过沟的秀才，問道于农民。农民告訴他跳，他并着双脚一跳，掉进水沟里。



弄髒了新衣，做不了客人的秀才，埋怨农民捉弄他。农民向他解释，说让你跳是让你两脚一前一后跨过沟，谁叫你并着双脚来跳呢？秀才不接受这种解释。理由在于：本本上的“跳”字和“跨”字有根本不同的解释，可见自己不错，错在对方。表演效果的好坏，起决定作用的，是说唱艺术的质量，不是演员的数量。金钱板《秀才过沟》举重落轻，一个人说出几个人的说话和行动，在单纯中见丰富，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如果不信任听众的智慧，不顾说唱艺术的特点和优点，改成满台歌手来演唱，用人教来“丰富”它，用人教来“提高”它，说表和对白的界限搞得混乱不清，不明白歌唱家们什么时候是角色，什么时候是叙述者，结果人多反而显得人少，缩小了艺术的境界，也埋没了合唱艺术的特长。

二

只有深深懂得欣赏者，艺术反映生活的手段才可能是大胆的，自由的。艺术家除了必须深刻感受生活，也必须深刻体会欣赏者的审美要求和审美能力。听众在生活实践、欣赏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是构成他们审美能力的一些重要因素。基于这，他可能欣赏艺术，欣赏那些对他来说即使是生疏的生活的反映。

明末清初的说书大家柳敬亭，正如当代有成就的评弹演员一样，是在和广大听众的联系中培养起来的，也是在听众喜闻乐见与否的考验中锻炼出来的。他很懂得书中的人

物，也很懂得听众的要求和能力。他那创造性的劳动，不只反映了现实，也间接地反映了听众的文化水平，审美能力，审美趣味。他说《水浒传》里的武松，生动地再现了武松，也适应了听众。《陶庵梦忆》（张岱）记述了他说的武松打虎的出色技巧。其中有一个特点是“闲中著色”：“武松到店沽酒，店中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壁皆瓮瓮有声。”为什么柳敬亭的“闲中著色”，能够借此打动听众，接受他歌颂英雄的内容呢？这只能从书的内容、形式和听众的感受的关系，求得应得的解释。一般说来，客观存在的艺术形象，不受听众精神活动的直接影响而有所改变。但是，基于每个听众不同的生活经验，不同的兴趣和偏爱，不同的着眼点，同一阶级的听众，面对客观的艺术形象，所得到的感受也不尽相同。曲艺的群众性，也在于它能够适应一般听众的感受。就一定意义说来，如果没有听众的“补充”或“再创造”，那些描写武松性格特征所使用的“闲中著色”的手法，不见得还能发挥它应有的魅力。说唱能不能收到动人的艺术效果，不只要把作品和生活比较，也要看形象能不能借有限的笔墨，诱导听众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形成和作品的形象密切联系的想像。形象是想像的出发点，也是想像的落脚点。如果形象不能比生活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那么也就不能和广大听众从生活中得来的丰富经验相适应。因为评书已经把武松的行动的影响描写得很生动，即令没有如实模仿武松怎样喊叫的声音本身，听众也可能从这种生动描写出发，看见更为广阔的生活，



由衷地接受了作品歌頌英雄的基本內容。如果和这相反，演員过高地估計具体模仿的力量，过低估計听众由生活实践欣賞实践所培养起来的感受力，在听众面前大喊“酒家拿酒来”，未必能够获得上述“闲中著色”那样的力量。

評书里的醒木，顾名思义，当然是促使听众注意評书內容的东西；也是一种表現力的构成因素。它有点像中国画的焦墨点子，用得恰到好处能够加强形象的刻划，濫用就丧失它的特殊作用和必要性。有功夫的說书人，决不为了造成緊張气氛，不惜把醒木当惊堂木使用，多拍，拍得很响。有时，似要拍响而輕輕放下，也加强了注意。更值得重視的，是醒木的使用，不仅可能加强听众的注意，誘导听众深入书的境界，而且也可以說是听众的反映的特殊形式的反映。正因为它是听众反应的反映，所以它就有可能成为加强注意的一种刺激力量。当然，醒木的使用有基本上固定的程式。这种相当稳定的程式，主要是在評书演出的长期实践过程中，說书人和听书人交流的长期过程中，不断深入体会一般听众的心理，而逐渐形成的。这就是說，所謂听众的反映的反映，不是指現場听书的听众，临时影响了使用醒木的程式，而是指程式的形成是包含了听众的反应在内的，因而它才能够成为听众精神上的启发和誘导。正如优美的唱能够使听众击节欣賞一样，醒木可能是不只拍在听众耳里，而且拍在听众的心上，原因就在于既是影响听众的，又是反映听众的。

在曲艺中，噱头所以是能逗乐的，也在

于它和欣賞者的生活經驗有密切联系。張效生在《馬跳圍牆》里說馬，有如下的噱头：“馬的面孔一板。馬总是板着面孔的，笑嘻嘻的时候見不着。”这不一定为了影射什么人，逗乐而已。欣賞者为什么会被这一种噱头逗乐了呢？显然，正如由馬的鬃毛說到人的头发，如果听书人不了解馬也不了解人，那么，这样的噱头对他說来可能是沒有作用的。

懂得听众的需要和能力，曲艺塑造形象，有更多的自由，可能大胆运用多种多样的手段。有本領的說书人手中的扇子，当它和曲艺的情节、演員的表情結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在听众的感觉上，常常是扇子又不是扇子。它是火焰，是墙，是一切。說书人在适当时机，有意暂时中断了說表，形成一种适合时宜的停頓。这种似断实联，以断为联的停頓，好像中国画布局中的空白，显然不是为了放松鼓动听众的目的，而是給予听众更大鼓动的一种特殊的手段。有时，在叙述緊張的战斗，偏偏要把話扯远，說一些和战斗本身关系不大的东西。这种扯远，仿佛只为了輕松，其实和上述的停頓那样，近似战术中的以退为进，是一种为一定目的服务的灵活性的措施。停頓是对于听众的反映的期待，也是对于听众的反映的促成。配合着前后的表演，它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获得征服听众的效果。問題在于，如果听众根本沒有相应的心理的条件，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懂得听众心理的相声演員，为了“包袱”能“响”，在“結包袱”的时候，讲究“垫穩”。所謂“垫穩”，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听众分心，引起不必要的联想，妨碍“包袱”的“响”。演



員在“揭底”之前，为什么有时要故意露出破綻，引起听众的怀疑呢？这正如上述“道反”一样，其实就是为了給听众接受噱头准备心理的条件。意料之外的“底”是逗人笑的，因为听众經過意料而又料不着，特別感到意外到来的“底”的有趣。不論說唱技巧多么复杂，归根到底，是如何真实反映生活，适应听众的心理条件，从而喚起相应的想像以至思索，使他得到欣賞的滿足，在思想上受到积极的影响。

“結果包含着自己的开端”，“結果就是原因的表現。”这是哲学家論認識客观事物的見解。这种說法，也可以用来解釋說唱艺术的形式的特点。評彈的某些特殊手法，例如寓因于果，果中見因；說东为了說西，說南可以代替說北，就是以此为依据的。青年演員石文磊的小唱《乒乓比賽》，特別着重表現乒乓热潮中的人們怎样兴奋的情緒，不一一描写为什么使人們兴奋的原因（運動員怎样杀球等等），也表現了上述特点。临时赶出来的这一小唱还不很成熟，但是就結果着手而使人体会原因，或者着重表現原因而使人預料結果这一点而論，它是新时代的曲艺艺术家創造性地体现了傳統艺术方法的表現。

曲艺描写客观事物，有一些非常自由，非常大胆的方式。用声音来描写視觉形象的手法，正如用色彩来描写声音一样，就是一种在別的艺术样式中不多見的手法。用声音的描写来代替視觉形象的描写，也和扇子、醒木的运用相似，这种描写，就一定意义而論，也是听众的生活經驗、形象記憶和情緒

記憶的一种再現的形式。

評彈《求雨》描繪午时三刻快要到来，众百姓不忍目睹用火燒人，天气突然变化，轉晴为雨的景象，使用了在一般情况下只用来形容声音，而不能用来形容物象的詞来形容物象：

……唉，真叫天有不測風云。

正在午时三刻，那边东北角上，一朵烏云，“嗚～～”飄过来，頃刻烏云滿天……

还没听见風声，只看見天上一片流动的烏云，对人說来，这还不过是一种視觉性的形象，怎么可以像形容海浪或江濤的声音那样，用“嗚～～”的声音来加以描写呢？所以是合理的，可以动人的原因，在于听众的感觉經驗以至情緒記憶，在欣賞过程中起了作用。突然出現的這一片烏云，那种滾滾而来的气概，它是期待下雨的人的心情的曲折的变形的反映，是落雨的預見和喜悅心情的形象化，同时也和听众过去的印象、感觉有联系。这一声“嗚～～”，和詩詞里那些傳神而且傳情的詩句，例如岑参的“朝登劍閣云随馬，夜渡巴江雨洗兵”相似，都不是現象的簡單的記錄，而是以艺术家和欣賞者的感受为依据的。这些似不合理，讀起来却很动人的詩句，在于就一定意义說来，它反映了欣賞者的感受。演員这种不拘于現象的复写，富于独创性的說表，不只表明他們熟悉生活的修养，再現生活的才能，也表明他們深深懂得听众的要求和能力。

就怎样适应听众而大胆虛构这一点而論，上海評彈团的演出，一再显示了上述长



处。评词《青春之歌》的演唱者赵开生，在描写余永泽回到家来，透过玻璃窗，看见他的妻子林道静和男同学卢嘉川谈话时，余永泽的视线，是用“嗖”的声音来描写的。视线不是飞镖，不是子弹，怎么可以说是有声响的呢？这，对于眼光充满了忌妒，心情卑劣的角色的描写，是巧妙的也是确切的。说唱者要是拘于视觉特征，不敢借用听觉感受，未必能够构成这样的感染力吧？对余永泽这样的角色的讽刺，这一声“嗖”是有力量的。在一定意义上再现了欣赏者的感觉经验，这种讽刺才具有特殊的感染力量。

在曲艺艺术中，这种用声音来模仿可视的物象的例子是很多的。比如说，两个互相倾慕的青年男女，眼光在不约而同地相遇的时候，评书演员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塌堂，碰上了”。描写英雄注视他的敌人时的眼光，有时用“咄、咄、咄”的声音来形容。压抑着的怒气的突然爆发，有时用“啪”字来形容这种爆发。这一切，正如醒木或扇子的运用那样，也如戏曲表现人的情绪的激变而使用“变脸”、“甩发”或“跟斗”那样，很特别。这是一种巧妙的富有表现力的手法。这较之把现实主义了解得很狭窄，以为“照着葫芦画瓢”就是高级的艺术，不惜把一些乏味的现象记录下来烦人的作品，至少在技巧上要高级得多。一切符合了人民的审美要求和审美经验的艺术手法，是包括前辈在内的作者们的高度智慧的表现。《青春之歌》等评词所运用的这种群众化的表现形式，体现了我国传统艺术的卓越成就。

最近听了上海的评词，再一次感到文艺

为政治服务的途径非常宽广，方式多种多样。我进一步感到，一切为群众服务的艺术，不论是内容庄严的纪念碑还是娱乐性的节目，都必须通过感人的形象，争取艺术欣赏者成为知己，在自愿而自然的情势之下，成为反映现实和认识现实的“合作”者，从而受到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育和鼓舞。教育，包括正确的审美标准和健康的审美趣味的巩固和培养，在艺术上的表现是潜移默化，而不是耳提面命。在艺术上任何生硬的方式，都不能产生应有的潜移默化的效果。我再一次感到，适应群众的欣赏要求和欣赏习惯，发挥说唱艺术的特长，较之生硬的说教，显然要困难得多。因为它的思想内容不是硬贴上去的，而是自然地流露出来的，这就要求艺术家有丰富的生活，充沛的感情，深入了解生活的内在意义。

曲艺是一种群众性的艺术形式，群众不只是曲艺家的教育对象，同时也是曲艺家的学习对象。传统的曲艺是在群众的需要和鼓舞之下发展起来的，它在反映生活和表达思想上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and 技巧。新时代的曲艺家，为了探索反映新的人物和生活的艺术方法，创造新的节目，需要学习和继承过去一切有益的表演经验和表演技巧；更有必要深刻了解新时代的群众，熟悉人民的生活、思想、愿望、心理和情绪，了解他们那种既有继承性却又是发展着的审美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新时代群众的要求，同时培养听众的审美能力，帮助他们深刻地认识生活。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曲艺艺术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



論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吳 江

量变质变規律，是唯物辯证法的根本規律之一。事物的发展，就是由事物內部矛盾引起的从量变到质变、又从质变到量变的过程，是质和量互相轉变、互相推移的过程。量变是指某一事物本身的逐渐发展，而不改变該事物的根本性质；质变則是量的漸进过程的中断，是事物根本性质的改变，也就是旧事物的消灭和新事物的产生。量变和质变这两者又是互相渗透的：质变过程中有量的擴張；量变过程中也有质的某种变化，有个別新质因素的产生和部分质变的发生。

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这是一种客观現象，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規律性。在事物的复杂的矛盾运动中，我們如果仔細去看时总可看出：每一具有特定性质的事物，在它发展的长过程中，在发生根本质变以前，一般处于下面这样的状态，就是：从总体上、全局上說，事物处于量变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事物的根本的质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发展是連續性的、漸进的；但从局部或某些方面來說，事物則又存在着某种质变的現象，由于矛盾的发展，事物的质局部地显出不安

定的状态，发展局部地呈現着非連續性、飞跃性。这两种情况，即量变和部分质变，准备着事物的根本质变。这种情形，不論在社会現象中，或自然界和思想領域中，都是普遍存在着的。

在社会現象中，拿中国革命來說。中国的民主革命，在这个革命完成以前，其反帝反封建的根本性质（或质的根本規定性）不变，但其中經過了好几个发展阶段，除开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这两个性质不同的大的历史阶段的区别之外，新民主主义革命也經過了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等几个发展阶段。新民主主义的各阶段的基本性质是相同的，它們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但是各阶段之間，不但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有量的区别，而且打击的对象有时主要是本国的反动势力，有时主要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同资产阶级的团结和斗争的具体情况也各有所不同，因此，各阶段之間又有若干质的区别。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这样，在它本身中包含着若干性质不同的阶段。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經依次地經過下列几次阶段性的部分质



变，而完成了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根本质变，就是：从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再到具有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在我国条件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依次经过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几种不同的形式，也就是依次经过了几次阶段性的部分质变。社会形态的发展，也是如此。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形成，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经过了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这三个阶段，这些阶段都具有部分质变性质。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阶段，也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一次深刻的部分质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在其发展长过程中，同样要经过许多不同的发展阶段，就大的方面说，包括从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到基本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比较不发达的阶段（从基本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时候算起）和比较发达的阶段（这是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去的阶段）。

在自然界中，这种现象同样存在着。例如，植物的个体发育周期，从幼芽到结实之前，是一个总的量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般要经过种粒发芽、长茎（形成植物个体）、开花等几个阶段，这些发展阶段有着部分质变性质，到最后结实而完成根本的质变。蚕的一生所经过的蚕、蛹、飞蛾等阶段，也都是部分质变性质，到产卵而完成了根本质变。人的机体的发展是细胞新陈代谢过程，人从出生到死亡之前，是一个量变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经过婴儿、童年、青年、壮年、老年这样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同样具有部分质变性质。

在思想领域中，我们同样看到，形成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之前，要经过一个积累大量事实材料（这是量变），并从中提取许多个别性原理的过程，使认识一步一步地发展，从不完全的认识到比较完全的认识，从不深刻的认识到比较深刻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个别性原理的获得，也带有部分质变性质。人们的思想改造，情形也一样，某种根本改造的目标，常常不是一下子所能达到的，而需要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的质变。

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除了表现为在同一发展过程中几个不同发展阶段一个接一个地向前推移的形式以外，有时也表现为一个事物的全局未变而其个别部分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例如，在我国长期的人民民主革命过程中，打碎旧的反动国家机器、建立新的革命国家机器，是一块一块、一片一片地进行的，即旧的国家机器在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地区上被打碎，新的国家机器随之在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地区上建立起来。凡是新的革命政权统治的地方，那里政治上已实现了民主，经济上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因素，就是说，那里社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不是原来的旧性质，而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了。但是，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前，这种变化还只是局部的，是个别新质态的逐步扩展，而不是全局性的变化。在我国现时条件下，实现生产的半机械化、机械化，半自动化、自动



化的革命，也是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进行的，首先在某些方面、某些部门实现机械化或半机械化，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即实现局部范围的质变，然后逐步扩展开去，以至于达到全局性的根本质变。

所以可以说，发展过程中有两种部分质变的形式，即一、在同一发展过程中几个不同阶段逐个推移的形式；二、全局未变而个别部分发生质变的形式。这两种形式的部分质变是互相联系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往往互为条件或者互为因果。中国革命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形成的新形势，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革命在局部地区首先夺得了政权，建立了红色区域，这也就是引起中国社会在局部范围内发生质变；而红色区域、红色政权的逐步扩大，又成为强有力的因素，推动了革命向下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发展。

上述这些现象说明了：量变过程中包含着质变，一种量变的大过程的内部也存在着局部的小的飞跃。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事物的根本质变，不仅是由不断的量变准备起来的，而且是由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质变（它们像一系列的阶梯）准备起来的。这些现象同时也说明：事物总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一种事物向另一种事物推移的过程是如此，一种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整个事物的根本质变，是发展过程中涌起的较大的波峰，而部分质变，则是发展过程中涌起的一些较小的波峰。

研究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无疑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量变质变规律的一个重要内容，研究它，无论在认识论方法论上，或者对于我们的实际工作，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论述矛盾的特殊性的时候，曾着重地指出：我们在研究和处理事物的矛盾时，不但要注意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的特点，而且要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点。他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①

毛泽东同志这段话告诉我们：所谓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各阶段互相区别，不但是指量的区别，而且是指质的某些区别；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殊性，既要注意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2页。



各个阶段上量的特殊性（事物发展的不同规模、程度、速度等等），又要注意各个阶段上质的特殊性，即被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许多大小矛盾的变化所引起的质的特殊情况。不懂得这一点，拒絶对于各种事物的质、各种事物的特殊性进行研究，并拒絶对于一种事物发展过程中各阶段上的质的特殊性进行研究，那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事物，就会在实践中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根据毛泽东同志这段话，也可以看到，事物发展过程中各个不同阶段的质的变化，即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因为它根源于事物内部的复杂的矛盾运动。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的本质，是由该事物所具有的根本矛盾所规定的。例如，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由资本主义本身具有的生产社会性和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所规定的，它通过资本主义的诸特性，如发达的商品交换、剩余价值的占有、产业后备军、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经济危机等等表现出来。中国民主革命的本质，由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所规定，通过民主革命的许多特性，如反帝反封建斗争、无产阶级为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并在其中起领导作用、农民是这个革命的主力军、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可以参加革命或保守中立，等等表现出来。事物的各种特性、各个方面，并不是一下子展开，而是在事物发展的各阶段上展开，有的在这一阶段上展开，有的在

那一阶段上展开。这里，我们就看到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下述两种情形：一方面，只要事物的根本矛盾不解决，事物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不管它在各阶段上会显出何种差别；但另一方面，随着根本矛盾的发展和逐渐激化，随着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各种大小矛盾的变化（有些激化了，有些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有些发生了），事物的个别特性和方面却是要发生变化的，在各个阶段上，有些加强了、向前发展了，有些减弱了或暂时地减弱了作用，有些消失了，有些发生了，也有些原来是非本质的东西而变成了本质的东西，或者相反，等等。正因为这样，事物的本质也不可免地要发生部分性的变化。

例如，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这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它的矛盾发展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间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资本主义突出地展开了或产生了垄断、财政寡头统治、资本输出、加紧掠夺殖民地和进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等方面，因而使资本主义自身发展到了垂死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说：“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的继续而成长起来的。”^①正是指的这种情况。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7页。



中国的民主革命，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全过程，其根本矛盾及为此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根本性质（反帝反封建），在过程结束以前，是没有变化的。但在五四运动以后，由于矛盾及矛盾双方的变化，这个革命的领导权转入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之手，使过程在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发生了变化，这就有了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因此形成了民主革命的新阶段，形成了新式的民主革命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互相交错和互相推移，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又联合又斗争，国共两党在不同时期有特殊的相互关系，革命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等等。所有这一切，使整个过程不断地展开新的方面，获得日益丰富的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三十年间所经过的几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的矛盾都呈现出许多特殊的情况，都有自己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各阶段的具体矛盾不同，各阶段也就随之而有自己不同于其他阶段的特性，提出了自己不同于其他阶段的具体任务。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说：“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①这就是说，不仅事物的整体在发展中向对立面转化，而且它的每一个特征、方面、特性都在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整个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当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

的主要方面不变、即事物整体的质不变的情况下，矛盾双方的斗争以及它们各自所发生的变化，也要影响事物的个别特性，引起它们的互相转化。例如，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向垄断转化，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里转到无产阶级手里，等等。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②

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一书依据敌我双方对比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抗日战争三阶段的分析，是一个非常辉煌的例子。毛泽东同志在这部著作中指出，例如，在敌是优势我是劣势的第一阶段，我方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特别是经济力量的减缩，但是，“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③第二种是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这些“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④敌方的变化则与此相反。在战争的长过程中，敌我双方各自所经历的这种质和量的变化，使双方力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9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3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57页。



量对比的形势不断发生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促成了战争过程由一阶段向另一阶段推移。

事物的全局性质未变而其个别部分的性质发生变化的情形又是怎样来的呢？这在根本上说来，是由于矛盾双方的特点所引起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矛盾双方的力量在各个局部上发展的不平衡而来的。我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局部地夺取政权，主要就是因为我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敌人方面是内部不统一，矛盾重重，革命力量则以武装斗争为支柱，以土地革命为基础。敌人虽然在城市中有强大统治势力，但在农村中相对薄弱，而革命在农村中则可以征集强大的同盟军，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因此革命力量首先有在农村地区胜利的可能。在广大农村中，敌我力量的发展也极不平衡，革命首先在自己力量积聚较快而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突破，建立起根据地，然后一块一块、一片一片地扩展。

由此可见，事物发展从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是根源于事物内部的复杂的矛盾运动，根源于矛盾发展的特殊性和不平衡性，因此，它在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形而上学观点或庸俗进化论观点不同，不仅注意事物的量，从量的方面来认识事物，而且更着重地注意事物的质，从质的方面来研究事物和区别事物。毛泽东同志说：“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

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①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得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要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必须特别注意对事物的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而要把握事物的质，毫无疑问，首先必须考察这种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区别和联系。例如，要把握资本主义的质，就要找出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各方面的特殊性；要把握社会主义的质，也必须找出社会主义之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自身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的诸方面的特殊性。我们目前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从这两方面的区别去弄清楚社会主义的相对独立的形态及其特殊本质，弄清楚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性，如此才能够制定正确的政策，并有把握地进行工作。

为了具体地精细地研究事物的特点，特别为了具体地指导改造事物的实践，像前面所分析的，我们还必须深入到每一个事物本身，去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质的局部性变化，找出该事物本身各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质的特殊情况。只有通过这种研究，我们才能进一步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事物的质和事物发展的规律性阐发出来，才能够更完全地认识事物和更恰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这也就是说，对于同一种矛盾，在其发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6—297页。



展过程中，由于阶段性的变化，在各阶段也須用适应于这种变化的具体方法去解决。

三

毛澤东同志曾再三指出，我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者，我們既須承认发展过程的不間断性，又須承认发展过程的阶段性；既須懂得照顾全局的必要，又須懂得关照各局部和各阶段的必要（因为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毛澤东同志在談到指导战争的时候，曾經指出：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問題。这个观点，对于指导革命，是普遍有效的。

毛澤东同志根据事物发展須經過不断的量变和許多部分质变而达到根本质变的規律，把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相统一的原理，不但应用于互相联系的性质不同的过程，例如应用于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应用于同一过程内部的不同发展阶段，例如应用于民主革命过程的不同阶段。所謂对于全局和各阶段关照得好，就是：我們从事革命事业，或变革某項事物，必須全局在胸，目标明确；同时又必須脚踏实地，按照客观程序，着重于分阶段、有步驟地进行。这也就是说，必須全力抓紧当前的阶段，完成当前的任务，在完成当前任务中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之后，再进入后一个阶段，如此使我們的事业能够不断地而又有秩序地向前推进。

毛澤东同志把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

变規律作为指导革命实践的一項重要方法。他在中国革命的长过程中，总是按照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适合于这些阶段的具体情况，并能够解决各阶段的具体矛盾的新的工作方針和方法，促进总的量变过程，更好地准备全局性的根本质变。这是我們的革命和建設事业能够迅速地 and 不断地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澤东同志正确地把握了和說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轉变，并且正确地提出了适应于这种轉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論和策略，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一系列极复杂的問題。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澤东同志同样是这样做，他指出：“在整个资产阶級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們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綱領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們的具体綱領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当然的事情。”^①

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是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而战争現象是較之別的任何社会現象都更多变化，更少确定性，即更带所謂“盖然性”的东西。但毛澤东同志对于战争阶段性的掌握，其准确性却达到令人惊奇的程度，当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往往就能根据战争发展的規律，預見到战局的进一步发展，除規定当前阶段的具体方針外，并提出一种貫通几个战略阶段的长时期的指导方

^① 《論联合政府》。《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63頁。



針，以夺取战争的胜利。

同样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毛澤东同志也总是按照事物发展的量变质变規律、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規律，逐步地变革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关系由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以不断地解放生产力，有步驟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例如，在完成将我国五亿以上的农业人口引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件特殊复杂、特殊困难的事业的过程中，早在一九五一年，在土地改革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完全結束时，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就已經规划出了一条包含三个发展阶段（互助組，初級农业合作社，高級农业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在完成了合作化以后，紧接着又找到了人民公社的道路，并且由此出发，指出在我国条件下，集体所有制发展成全民所有制，必須經過下列三个阶段，即：以生产大队的所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制，过渡到将来的公社基本所有制，再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一发展过程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由农业合作社联合組成的人民公社，是一般地由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級組成而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級集体所有制，它是集体所有制本身的一次部分质变，它不是否定集体所有制，而是发展了和提高了集体所有制。

我們的革命事业和建設事业，就是这样有預見地、有步驟地向前发展的。在我們的主观指导上，注意了这一个过程到那一个过程的推移，同时又注意了一个过程内部不同阶段的推移，这样，就丰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相統一

的原理。

我們承认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的規律，从認識上說来，就是承认事物发展中包含着下述两个方面的情況，即：从一方面說，在变革一个事物的长过程中，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过程内部必然会有阶段性或局部性的变化发生。无視这种必然性，不承认这种变化是事物本身的客观趋势，在實踐中必然会犯錯誤，其結果就会阻碍或延緩这一过程本身的发展。但是，从另一方面說，任何事物或任何阶段，又都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由自身性质所决定的界限，我們在實踐中决不能忽視这个界限。事物的部分质变状态，同根本质变一样，都不是突然来的，而是由量变积累起来的，质的突变是由量的渐变准备起来的。量变不达到一定的限度，不到一定的关节点，事物也不可能发生部分质变。例如，互助組的生产力如果不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使土地分散經營和集体劳动之間的矛盾显得突出，互助組就不可能进到初級农业合作社；同样，初級农业合作社的生产力如果不发展到使土地分紅制度和生产力发展之間的矛盾突出，也不可能进到高級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之联合成为人民公社，也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此等等。

世界是絕對地永恒地发展着的，任何事物、过程的界限都不是絕對不变的，在过程内部各阶段之間当然更是如此；但是，一切个别的事物，个别的阶段，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的時間内，又都具有质的相对固定性，就是說，是有确定的性质的，它是某种固定的事物。人們認識事物，首先須判定該事物



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对于事物的性质有一定的认识，才有可能进一步研究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的变化发展。不懂得一事物一过程或过程内部各阶段的质的相对固定性，就无从理解事物的发展。因为事物的发展总是由一种质到另一种质，由一阶段到另一阶段。这也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的客观程序，不断地突破旧的界限而形成新的界限（成为新的事物，或达到新的阶段），形成了又突破，突破了又形成。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主要条件”^①。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对于变动性最大的战争这一社会现象，也曾这样说过：“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②，因此，我们“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这点，就否认了一切，连战争本身，连说话的人，都否认了。”^③“没有人否认，就是在某一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方针，它也是在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这种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我们所谓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的这一点。”^④

各种事物的发展都是如此。当着某种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应当使这种生产关系状态有一个改变，有一个质变或者

部分质变，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在生产关系经过某种变革已经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或基本相适应的时候，就应当使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巩固和稳定下来，并使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各项工作制度、政策、方针等，在一定时间内获得相对的固定性。例如，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或在社会主义的某一阶段内，就应当使社会主义的或者社会主义某一阶段的各项原则、方针、政策，获得相对的固定性。我们在工作中所需遵守的政策界限，乃是客观事物本身的界限的正确反映，是经过实践从客观事物抽象出来的，并不是人们随意设定的。我们只有严格遵守事物本身的界限，不主观随意地突破这种界限，这才有利于事物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工作的发展。

承认过程或过程内部各阶段的相对固定性，并不等于形而上学或者保守主义，这是不应有所混淆的。只有不懂得事物的界限、物质的固定性的相对意义，有意无意地赋予事物的界限以绝对的意义，才有可能成为保守主义者。我们所说的事物的相对固定、相对静止，并不是事物的凝固不变，而是事物变化的一种状态，即事物的量变状态，它是相对于事物的质变状态而言，为质变作准备。我们革命者固然重视质变，要积极促进

①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0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8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8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85—486页。



事物的质变，但是，沒有量的准备，就沒有部分质变，更不能有根本的质变。忽視量变就要走上冒險主义。因此，我們在任何时候决不能不顾量的准备而实行无根据的部分质变以至根本质变。对于我們的主观指导說来，必須力求認識事物发展的量的基础，認識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引起部分质变，經過若干部分质变才能达到根本质变，以便按照客观进程，發揮主观能动性，踏踏实实地进行工作，促进事物量的增长，扶植新质因素的生长，以获得預期的部分质变以至根本质变。

任何质变，都包含着量的擴張，并把量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我們看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生产关系发展的每一个部分质变，都使社会主义的新质因素大量增长，促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們說部分质变是全局性的根本质变的准备和前导，我們如果認識它，掌握它，就能促进总的量变，加速全局性的根本质变。为什么我們要重視部分质变这种現象呢？归根到底，其原因正在这里。但是，部分质变并不改变事物的根本規定性，并不代替全局性的根本质变。部分质变和根本质变是不同的两回事，因此，我們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們混淆。

如果事情已发生了全局性的根本质变，而认为只是部分质变，那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事情只是发生部分质变，而就认为已达到了全局性的根本质变，这在社会变革方面，依据具体情况，也将或者犯右的錯誤，或者犯“左”的錯誤。右的錯誤，例如把资本主义国家中自由资本主义向壟断资本主

义的发展，或者一般壟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壟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成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本性的改变，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因而否认革命变革的必要，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堕落成为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左”的錯誤，例如中国过去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曾有所謂“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轉变之时”的說法，这就是把民主革命中的部分质变看成是全局性的根本质变，看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

毛澤东同志曾反复地向我們指出：我們的認識和行动既不可落后于客观过程，也不可超越客观过程。他要求我們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承认事物发展阶段的客观性，不能作任意的处置，而当某一客观过程已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轉变的时候，我們自己的主观認識也必须跟着推移轉变，以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我們对待事物的矛盾，需要很好地考察发展过程中量变和质变、总的量变和部分质变、部分质变和根本质变等諸方面的关系，認識它們，并且正确地处理它們。事实证明，注意研究发展过程中部分质变的規律，把它作为一种方法更好地加以应用，将会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一步一步地，积极而又稳妥地推动我們各項工作、各項事业前进。



美国种族关系上的“良好记录”

陈 原

近年来，美国官方老爷们对掩盖国内种族歧视的丑恶现象，确实是煞费苦心。

去年十月间，肯尼迪在一次竞选演说中提出：“美国必须在国内消除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的一切痕迹”。他还尽力表白：“种族隔离和暴行，这些在国外恶劣地歪曲我们的形象和在国内削弱我们的力量的东西，只是美国真相很小的一部分。”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斯，比他的上司讲得更动听。他在今年三月访问尼日利亚时竟大言不惭地说：“我敢说，尽管有一切渲染，但是在种族关系上，美国几乎和其他国家一样有着良好的记录。”

在威廉斯讲这番话以后为时不过两个多月，美国国内在种族关系上又出现了一次“良好的记录”。

今年五月二十日，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城发生了凶殴黑人的政治性暴行，一千多名种族主义者，毒打一群黑人青年和反对种族歧视的白人青年。这些青年是美国“种族平等大会”发起的“自由乘客运动”的参加者，他们共同乘着公共汽车到南方各州去进行反对种族隔离的示威。他们在进入亚拉巴马州之后，已先后在安尼斯顿和伯明翰两地遭到种族主义分子的毒打。在蒙哥马利城的暴行中，至少有二十个黑白青年被殴重伤，呻吟路旁，尽管暴行进行了几小时，而

这“文明”国家的警察，却竟然熟视无睹。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完结。这些参加“自由乘客运动”示威的黑白青年，继续乘公共汽车到邻近的密士失必州，向美国的“文明”挑战。当他们在警察“护送”下到达这个州的首府杰克逊市时，当局借口他们在车站进入“白人休息室”，以“破坏秩序”的罪名，将他们逮捕并判处徒刑和罚款。看，在自称为世界上最“自由”“民主”的国家里，统治者竟以维护种族歧视的法规来惩办和监禁挺身反抗种族歧视的正义的青年男女，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

这次暴行遭到了世界进步人士的谴责。西方“自由世界”的舆论对此也议论纷纷。肯尼迪政府陷入了十分狼狈的境地。一个肯尼迪（司法部长）劝导人们要“冷静”，另一个肯尼迪（总统）呼吁不要“再事挑衅”。美国的统治阶级显然担心这类事件会无情地揭露美国种族关系的真相。众院外交委员会非洲问题小组委员会主席奥哈拉忧虑这将对美国国际关系产生“不良影响”；参议员汉弗莱也担心这个事件“使美国的民主和国家目标成了一种笑料”。他们的忧虑是有来由的，野蛮的暴行的确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文明”和“自由”究竟是什么货色。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说，亚拉巴马州已经“堕落到足以同当年希特勒德国的悲惨日子相比拟的野蛮状态。”驻在美国的一位外国大使认



为，美国种族事件的继续发生对他造成了一种“危险的后果，使他日益难以在美国活下去。”

西方“自由世界”的那些有几百年对付非洲人民的血腥“经验”的老牌殖民主义者，趁机奚落美国。英国保守党的《每日快报》忿忿然说：“美国没有权利评论英国在罗得西亚的问题。”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也不放过对美国报复的机会，因为不久以前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美国为了把自己装扮成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者”，以欺骗、拉拢非洲人民，曾经假惺惺地投票赞成关于调查葡萄牙镇压安哥拉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提案。现在，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反唇相讥，说你美国连国内的“种族障碍”也“粉碎”不了，有什么资格来投反对我葡萄牙的票？这样一来，“自由世界”的一池烂泥水，因亚拉巴马州的新暴行，搞得更加混浊不堪、其臭难闻了。

亚拉巴马州暴行是否只是个别的事件，是否像肯尼迪说的只是“美国（种族关系）真相很小的一部分”呢？

其实，种族歧视在美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黑人每日每时都有可能遇到种族隔离、私刑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政治上或经济上的迫害。对黑人的迫害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正如美国《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所供认的：种族主义的“四处散布的、无孔不入的细胞已侵入我们（美国）社会的每一个组织。”

美国的黑人处在严酷的种族隔离制度下，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同白人有平等的地位。例如，在城市中划分了黑人区，黑人只准住在某几条街上，不许住在白人住宅区中；黑

人区不仅设备恶劣，而且房租租金奇昂。据不完全的统计，有二十二个州的法律规定或事实上不许黑人儿童跟白人儿童同上一所学校或同在一个班级；有三十个州不准黑人与白人通婚；有十四个州的火车和十一个州的公共汽车只准黑人坐在指定的车厢或后排；许多州事实上不许黑人进入一般戏院、电影院、饭店、旅馆、公园、图书馆和医院。正因为如此，近年来，许多非洲国家的外交官在美国受到了侮辱。《纽约先驱论坛报》承认，一个非洲外交官可以连续几个月走遍每一所像样的住宅和旅馆，但只能得到同样的答复：“不租给黑人！”事情弄得如此之糟，以致美国政府当局竟异想天开地要在某处开辟一个专门让非洲国家的外交官能与美国“优秀”白人享受平等权利的海滨游乐场！

黑人的政治权利也是没有保障的。美国许多州的法律都有限制黑人参加选举的规定，例如选民必须交纳一定数量的人头税和要具有一定的“教育程度”等等。有些地方的选民登记处的白人官员用各种所谓“考试”、“智力测验”等办法，剥夺黑人的选举权。他们甚至提出“一块肥皂有多少泡沫”“白宫有多少窗子”等这类稀奇古怪的问题刁难黑人。即使是纳得起人头税、通过了“考试”的黑人，他们在走向投票的道路上也绝不是平安的，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组织的恐吓和迫害在等待着他们。在许多地区，黑人选票的代价，就是“一张票一条命”。

在经济上，黑人的命运也是极其悲惨的。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往往只被雇佣当苦工，不能担任高级技术性的工作。黑人和白人同工不同酬，黑人的工资通常只及白人工资的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他們也是遭受失业痛苦最深的人，經常是先被解雇，后被雇用。

更令人发指的是，三K党、“白人至上”集团、“白人公民委员会”和納粹党等法西斯組織，經常施用惨无人道的私刑迫害黑人。他們对黑人施用私刑的“理由”是很多的，如黑人进入了供白人享用的飯館，靠近白人妇女的身旁走过，在会见白人时脱帽不够迅速，回答白人的問話时不够“恭敬”等等，都会使黑人遭到私刑的凌辱与杀害。

列宁早在一九一三年就說过，“美国黑人的一般状况是同文明国家不相称的：資本主义不可能使人們彻底解放，甚至也不可能使人們完全平等。”^①随着美国壟断資本主义的发展和政治上的愈加反动，黑人經過长期斗争所爭取到的、并为美国宪法所承认的“平等”，愈来愈受到蔑視和摧殘。

美国統治階級多年来散播种族仇恨的种子，挑撥白人迫害黑人。他們的真正目的，正如列宁所說的，是为了“蒙蔽工人的眼睛，使他們看不到劳动人民的真正敌人——資本。”^②然而，人們也要提出这样的問題，为什么美国統治階級，現在忽然特別担忧种族歧視的“家丑”外揚，想尽办法要把它掩盖起来呢？其奥秘在于：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入非洲，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視这桩“家丑”大大不利于美国爭取非洲人民的“尊重”和“友誼”。参議員丘奇就担心“如果（美国）再发生悲惨的种族暴动的話，就会使撒哈拉以南的每一个新国家的信仰和友誼受到損害。”肯尼迪在上台之前就大肆喧嚷什么要“在国内消除种族歧視”，并对他們中意的黑人（如哈奇尔、本奇之流）吹吹捧捧，封官賞爵，而在上台之后，又

对非洲左一个“和平队”，右一个“訪問团”，假獻殷勤，目的都是一个——用肯尼迪的話來說，这是为了“爭取非洲黑种民族的尊敬和友誼”，保证在非洲“打贏爭取人心的仗”。

美国統治者处理国内种族关系的“良好記錄”与对非洲人民的“尊重”和“友誼”，非洲人民是清楚的。南非《兰德每日邮报》編輯勞倫斯·甘达尔在訪問美国后說：“美国对国内有色人种的歧視和迫害絕不亚于以种族歧視而臭名远揚的南非联邦。”《加納时报》在一篇文章中揭露美国对非洲人民进行欺騙宣傳时指出：“当非洲人一接触到美国实际时，他們馬上就会認識到美国这种宣傳的虚伪性。甚至非洲各国委派到华盛顿的官方代表也已尝到了美国种族歧視的滋味。”文章还說：“美国在本国实行着种族主义政策，那末很自然它在非洲也会照样实行种族主义政策。”

在亚拉巴馬州事件之后，美国很多大城市爆发了黑白人联合示威游行，例如洛杉磯参加示威的黑白群众，同唱着新編的战歌，高呼着这样的口号：“我們不要干涉古巴。我們不要干涉老撾。我們需要干涉亚拉巴馬。”这些事实表明：不管美国統治階級迫害鎮压也罢，欺騙麻醉也罢，人民爭取民主和自由的意志是消灭不了的。他們正在团结起来向反动統治階級进行愈来愈坚决的斗争。《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說：“在通往南方各州的道路上，新的“自由乘客”的小組接踵而至，向南方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挑战。”这何尝是仅仅向“南方”，这是向整个美国种族歧視制度的挑战！

① 《俄罗斯人和黑人》。《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42頁。

② 《論殘害犹太人》。《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1頁。



形式邏輯研究什麼？怎樣研究？

· 吳 家 國 ·

讀王忍之同志《論形式邏輯的對象和作用》一文后，學到了不少東西。其中有些看法我是同意的，例如：形式邏輯是從形式方面來研究思維的，它不研究思維內容；思維形式與思維內容是統一的，又是矛盾的，形式邏輯可以把思維形式抽取出來進行研究；學習形式邏輯有重要意義。但同時，覺得其中有些問題還需要商榷。例如，王忍之同志認為，形式邏輯研究“思維形式結構”，“揭示思維形式結構的規律”；形式邏輯在研究思維形式時“把內容放置在一邊作為不相干的東西”，“在純粹狀態中”去進行研究；形式邏輯的作用是“把思維內容確定地、不矛盾地、有條理地組織起來和表達出來”^①，等等。這種看法我以為是不對的。本文就這些問題談些不同的意見。

對於形式邏輯這門科學研究的對象是什麼，人們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大体上可以歸納為兩種：一種認為形式邏輯的對象是一般的思維形式，另一種認為形式邏輯的對象是思維形式結構。這兩種看法雖然不是絕對對立的，可是卻有不同。所謂“一般的思維形式”，其含義是比較廣的，它可以指思維的各部分之間的聯系方式（如推理中前提與結論

之間的聯系），也可以指用符號表示的思維形式結構（如S是P），同時，還可以指思維形式的邏輯特征（如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等）；所謂“思維形式結構”，只是思維形式的一部分。王忍之同志卻把這兩個不同的概念等同起來，有時說“思維形式結構”，有時又說“思維形式”。不過，從整篇文章看來，王忍之同志的基本主張是前者，而不是後者。那麼，王忍之同志的看法是不是正確呢？我認為是不正確的。

形式邏輯科學是由亞里士多德創立的。列寧在論述亞里士多德對邏輯的貢獻時指出：“亞里士多德如此完滿地敘述了邏輯形式，以致‘本質上’沒有什麼可以補充的。”^②列寧所說的邏輯形式（即思維形式）有哪些呢？這就是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工具論》中所提出並加以研究的“概念”、“判斷”、“三段論式”、“證明”、“證明的方法”、“下定義的方法”、“反駁的方法”等。此外，亞里士多德

① 王忍之：《論形式邏輯的對象和作用》，《紅旗》1961年第7期，以下引文凡未註明出處者，均引自此文。

② 《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2—193頁。



还提出了矛盾律、排中律，并在实际上提出了同一律的思想。在十七世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弗兰西斯·培根在《新工具論》一书中，对科学归纳法諸問題作了系統的闡述，奠定了归纳邏輯的基础。后来，保尔——罗亚尔派明确地把形式邏輯的对象确定为研究概念、判断、推理、方法。十八世紀初，莱布尼茨对充足理由律作了明确的闡述。这样，形式邏輯这門科学的内容，有了很大的发展。

形式邏輯的上述内容，是否都屬於形式結構的問題呢？这应当作具体分析。

形式邏輯所研究的内容，就它們有无形式結構來說，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一）有形式結構的，如直言三段論式等；（二）既有形式結構，又不全是形式結構的，如归纳、思維規律等；（三）根本沒有形式結構的，如邏輯方法等。对于这三个部分，不应当过分強調某一部分，而忽視另外的部分，也不应当以其中的一部分来概括形式邏輯的全部内容。

王忍之同志虽然沒有說明形式邏輯的基本内容，也沒有說明归纳邏輯、充足理由律、邏輯方法是否也是形式結構問題，但是，由于他既沒有否定这些基本内容，却又认为形式邏輯的对象是思維形式結構，这就不能不使人认为，王忍之同志把归纳邏輯等看作为形式結構的东西。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以归纳邏輯为例。归纳邏輯虽然也有形式結構，但归纳邏輯还包括观察、实验等邏

輯方法，它与思維内容的联系更加密切，与人們的認識的联系也更加密切，因此，归纳邏輯不只是形式結構。

再以充足理由律为例。充足理由律是正确思維的一个基本的邏輯規律。充足理由律要求之一，就是理由应当真实，否則就会犯虛伪理由的錯誤。这能說是对形式結構的要求嗎？不能。因此，充足理由律不是思維形式結構的規律。

形式邏輯所研究的分析、綜合、抽象、概括、定义、划分等邏輯方法，它們都沒有形式結構，如果要去寻找分析、綜合等的形式結構，那是找不到的。因此，更不应当把形式邏輯的对象限制为“思維形式結構”。

既然归纳邏輯、充足理由律、邏輯方法等都是形式邏輯的对象，所以把形式邏輯的对象局限为“思維形式結構”，就必然要把它們統統排斥在形式邏輯之外，这是不妥当的。

根据以上理由，我认为可以把形式邏輯的对象，作如下的概括：形式邏輯是研究思維形式及其基本規律以及普通邏輯方法的科学。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形式邏輯科学的实际，否則，就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这在实质上，就会把形式邏輯的内容貧乏化，变成只研究推論方式的純演繹的邏輯了。

王忍之同志說得对，“形式邏輯所研究的問題，相对于思維内容來說，乃是形式方面的問題。”形式邏輯決不去研究思維内容。但是，在肯定这一点之后，不应当由此得出結論說，形式邏輯在研究思維形式时，就可以不管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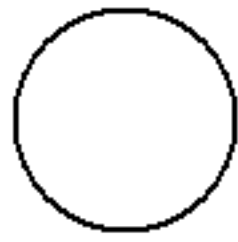
容,而把內容放置在一邊作為不相干的东西。我認為,“不研究內容”與“不管內容”,這是兩個概念,而不是一個概念,是兩個問題,而不是一個問題,不能把它們混為一談。所謂“不研究內容”,主要是指形式邏輯不去判明思維內容是真是假,何以為真,何以為假,以及判明真與假的客觀標準。要解決這些問題,只能依靠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各門具體科學。所謂“不管內容”,實際上是指形式邏輯在研究思維形式的時候,根本不管內容是真是假,在推理中,就是不管前提內容是否真實,“大前提一出,形式邏輯便可以據以為推”^①。王忍之同志雖然沒有明確說出這一點,但是,從他的文章看,他所說的在研究思維形式時,把內容作為不相干的东西,實際上只能作這樣的理解。顯然,在這兩個概念中,只有前者是適合於形式邏輯的。所以,我認為形式邏輯在研究思維形式時,應當聯繫思維內容,即在思維形式與思維內容的聯繫中來研究思維形式。

什麼叫聯繫思維內容呢?怎樣聯繫思維內容來研究思維形式呢?一般地說,“思維內容”這個概念有兩種含義:一種含義是指思維的具體內容,比如“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個判斷的具體內容,就是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只是貌似強大,實則虛弱,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群眾等;另一種含義是指思維的一般內容,比如“丙是乙的一部分,甲是丙的一部分,所以甲是乙的一部分。”這個推理的一般內容,就是三個概念之間所表現的正確的種類包含關係。形式邏輯研究思

維形式,主要是聯繫思維的一般內容,即要考慮到思維形式的客觀根據。比如:在研究推理時,就是要考慮到從前提到結論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事物的種類包含關係。除了聯繫這種思維的一般內容之外,形式邏輯在研究思維形式時,還要聯繫思維的具體內容。當然,這種聯繫不是主要的,但卻十分必要。所謂聯繫思維具體內容,主要是說:第一、形式邏輯在研究思維形式時,要考慮到由於客觀事物發展變化或由於人們的認識的發展變化所引起的思維內容的變化,以便使思維形式相應地改變,使形式為內容服務;第二、形式邏輯在研究思維形式時,要考慮到思維內容的真與假,在推理中,就是要考慮到前提內容的真與假,並且主張一個正確的推理,除了要求遵守推理的規則以外,還必須要求前提內容是真實的。(注意,這裡說的“考慮”,並不等於研究,更不等於解決。)

以概念為例來說。形式邏輯是從內涵和外延這兩方面來研究概念的,而內涵與外延是指具體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離開了具體概念,也就沒有什麼內涵和外延了。因此,形式邏輯研究概念的內涵與外延時,就必須結合或通過具體概念來進行。而且,為要真正明確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就必須考慮到概念的歷史發展。例如,當研究“人民”這個概念時,就必須考慮到“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着不同

^① 周谷城:《形式邏輯與辯證法》(見《邏輯問題討論集》第8頁)。



③

...

...

...

...



的內容。”^①而不能在純粹狀態中來研究“人民”這個概念。只有考慮到“人民”這個概念的歷史發展，才可能真正掌握它的內涵與外延。

再以王忍之同志在文章中所舉的一個推理的例子來說，“所有的英雄人物都是上應天象的，岳飛是個英雄人物，所以岳飛是上界星宿下凡。”這個推理是古人所作，現在看來，前提內容異常荒謬，但是，由於受到當時的科學發展水平和人們的認識水平的限制，古人在主觀上是斷定這個前提為真的，所以才進行推理。今天，人們不會再斷定這個前提是真的了。既然大前提已假，就不必再推，如果仍然要推，雖然它的形式可以是正確的，可是，必須指出，在這時形式已經脫離了它的客觀內容，因此，這種形式就不能幫助人們獲得真理。而且必須指出，這種客觀情況並不能否定作為一門科學的形式邏輯是要求內容和形式統一的。

形式邏輯在研究思維形式時所以應當聯繫思維內容，是有理論上和事實上的根據的。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內容，並以一定的形式存在着或者表現出來。有什麼樣的內容，就決定有什麼樣的形式，內容變了，形式也應當變，內容和形式是統一的；但是同時，辯證唯物主義還認為，任何事物，當它的形式形成之後，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內容和形式又是矛盾的。思維也是這樣，思維形式和思維內容是統一的，又是矛盾的。正由於思維形式具有相對獨立性，人們才可能把思維形式抽取出來加以研究，從而產生了一門獨立的科學——

形式邏輯。

可是，形式邏輯之成為一門科學，決不僅僅是因為它研究的是思維形式，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它研究的思維形式是人們頭腦對於客觀現實的反映。形式邏輯科學正是在思維形式和思維內容的統一中來研究思維形式的。當然，科學可以把互相聯繫的某一方面相對獨立出來進行研究，但是，在研究時決不能否定或割斷它們之間的聯繫。如果人們只是注意了思維形式對思維內容相對獨立的一面，在研究思維形式時，把這種相對獨立性加以誇大（王忍之同志正是這樣），甚至忘記或忽略了它和思維內容的聯繫的一面，只研究純粹形式，那麼，就不能夠把握思維形式本身的本质、規律。因為思維內容與思維形式是互相矛盾的統一體，人們要了解這個統一體中的一方（思維形式），就必須把它放到與它對立的另一方（思維內容）的相互聯繫當中，只有這樣，才可能真正掌握它的本质。

大家知道，生產力同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內容與形式之間的關係。政治經濟學只是研究生產關係，而不研究生產力，但是，政治經濟學是聯繫生產力來研究生產關係的，而不是脫離生產力去研究純生產關係，只有這樣，人們才可能真正掌握生產關係本身發展的規律。這就說明，雖然一門科學可以研究某種形式，但是，在研究形式時，不能不聯繫內容。

形式邏輯也是如此。例如，直言三段論

^①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頁。



中第一條規則說：“在每一個三段論中，只能有三個名詞。”並且指出，違反了這條規則就要犯“四名詞”錯誤（“四名詞”錯誤，實際上也就是偷換概念的錯誤）。有這樣一個例子：“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黑格爾的方法是辯證法，所以，黑格爾的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這個推理犯了“四名詞”錯誤。形式邏輯為什麼能指出這個推理的錯誤呢？主要是因為它聯繫了推理的內容，即考慮到大小兩個前提中所使用的“辯證法”這個概念含義是不一樣的。如果不聯繫內容，要知道這個推理是否有錯是困難的。這說明形式邏輯規律、規則的本身就要求要聯繫思維內容，否則，是不可能真正掌握這些規律、規則的。

這樣說來，是不是完全否定了有研究純思維形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呢？不。但是，應當指出，根據形式邏輯本身的性質和特點，形式邏輯不能進行純思維形式的研究。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意見，形式邏輯首先是認識的工具，同時又是證明的工具。恩格斯指出：“他（指杜林——引者注）認為辯證法是某種單純證明的工具，正像由於狹隘的理解可以把形式邏輯或初等數學看成是這樣的工具一樣。可是甚至形式邏輯首先也是尋找新結果的方法，由已知進到未知的方方法。”^①恩格斯的這話，說明形式邏輯雖然只研究思維形式，但是它研究思維形式的目的是服務於思維內容，服務於人們的認識，即是為了獲得新知識，也為了正確的表達已有的認識。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是把形式邏輯當作必要的、比較簡單、初級的認識方法和證明方法。列寧指出：形式邏輯“是根據最普通的或最常見的東西來做形式上的定義，而且只是這樣做定義。”^②在這裡，列寧雖然只指形式邏輯的定義方法，可是這卻比較集中地、突出地表現了列寧認為形式邏輯有局限性的思想。

形式邏輯的這種初級的認識工具和證明工具的性質，決定了它在研究思維形式時，不能把思維形式放在與內容毫不相干的純粹狀態中來研究。因為純粹狀態的空洞的形式是不能把握真理的。

充足理由律是形式邏輯的一條基本規律。它要求任何一個論斷都必須有充足理由。有了這一要求，就能為達到真理提供必要條件。人們要真正掌握這一條規律，就需要聯繫思維內容。充足理由律同時也是形式邏輯的證明理論的根據。從這裡，也就說明，形式邏輯在研究思維形式時，為要達到正確的認識，是不能不聯繫思維內容的。

這種情況還突出地表現在“證明”這一思維形式中，形式邏輯的證明本身有幾條邏輯要求，諸如論題保持同一、論據必須真實、論據應為論題的充足理由等。這些要求對於正確的證明都是不可少的。而要運用這些規則，就必須聯繫思維內容。

①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38—139 頁。

② 《列寧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83 頁。



由上述可知，我們所以主張要联系思維內容來研究思維形式，是從形式邏輯本身的性質和這門科學的實際情況出發的。我們並不否認，思維形式可以在純粹狀態中研究，事實上，數理邏輯就是這樣來研究思維形式的。恩格斯在論述數學對象時說：“為要能夠在其純粹狀態中去研究這些形式和關係，那麼就必須完全使它們脫離其內容，把內容放置一邊作為不相干的东西；這樣我們就得到沒有面積的點，沒有厚度和寬度的綫， a 和 b ， x 和 y ，常數和變數。”^①恩格斯這段話當然是正確的。問題在於王忍之同志認為：“恩格斯的這段話也適用於形式邏輯。”這樣，王忍之同志就把數學與形式邏輯在性質上的差別忽視了。這是不妥當的。

數學和形式邏輯這兩門科學的研究對象的側重方面以及他們的研究方法，是比較相似的，即數學只研究事物的量的關係這一方面，形式邏輯只研究思維形式這一方面；數學在研究事物的量的關係時，是撇開事物的具體本質的，形式邏輯在研究思維形式時，在一定的時間內也是可以暫時撇開（不是完全撇開）思維內容的。可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數學與形式邏輯是有差別的，而且這種差別是基本的方面。因為這種差別是由這兩門科學的不同的性質和特點決定的，形式邏輯是初級的認識方法和證明方法，而數學就不是這種方法。因此，形式邏輯與認識論的關係，要比數學與認識論的關係更為接近、密切。因此，把形式邏輯與數學等同起來，認為恩格斯那段話也適用於形式邏

輯，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此外，形式邏輯要以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為指導，要貫徹實踐的觀點。可是，如何達到這一目的呢？重要的問題之一，就在於形式邏輯要不要從大量的思維材料中總結、概括新的邏輯理論。在這一點上，王忍之同志有一段話是說得很好的：“應當研究大量的豐富的思維材料……。只有進行了這樣的 research，在大量的思維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抽象概括，我們才能獲得思維的形式結構的種種類型及其相互關係的知識。”不過，也正是在這一點上，王忍之同志在另一個地方卻說：“要在純粹狀態中研究思維形式及其關係，……這樣我們才能認識思維形式的種種類型，認識它們的本質、規律”。這是自相矛盾的。

其實，研究大量的豐富的思維材料，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抽象概括，這就是說，要在思維內容與思維形式的統一和聯繫中來進行抽象概括，因為所謂思維材料，其中有內容，有形式，它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物。既然是這樣，為要達到同一個目的，即“認識思維形式的種種類型，認識它們的本質、規律”，所以，就不能如王忍之同志所說，必須“在純粹狀態中”去研究，而必須在思維形式與思維內容的統一和相互聯繫中來研究。

這樣一來，形式邏輯會不會代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各門具體科學呢？回答是否定的。這裡的關鍵是在於：聯繫思維內容並不等於研究思維內容，考慮思維內容的真假并

^①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頁。



不等于判明思維內容的真假，要求遵守充足理由律并不等于能够达到充足理由。

例如，前面曾提到直言三段論的第一條規則。我們主張必須联系推理的內容來考察這一規則，即考慮到大小前提中，名詞是否發生歧意。不過這僅僅是考慮到，而不是根本不問。要真正判明前提中的各名詞是否同一的外延和內涵，只能依靠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各門具體科學知識。形式邏輯是無法完成這項任務的。

根據以上分析，我不能同意王忍之同志提出的“在純粹狀態中研究思維形式及其關係”的觀點。

正由於王忍之同志把形式邏輯的對象局限為“思維形式結構”，並且主張要在“純粹狀態中”去研究，因此，他就把形式邏輯的作用限制為“能判定思維的形式結構是否正確”，“能保證我們的思維具有正確的形式結構”，“能夠把思維內容確定地、不矛盾地、有條理地組織起來和表達出來”。雖然王忍之同志也曾提到：“在判明前提正確的條件下，遵循了形式邏輯的規律規則進行推理，那我們就能夠獲得包含某種新知識的結論。”但是，必須指出，這種新知識的獲得，仍然只是通過“檢查思維形式正確與否”來達到的。這就是說，即使是王忍之同志也似乎提到了形式邏輯的認識作用，但是，這決不是主動的、積極的認識作用，即通過推理就可以獲得新知，而是意義非常狹窄的、消極、被動的認識作用，即通過檢查思維形式結構來獲得新知的。由此看來，王忍之同志心目中的形式邏輯的作

用，實際上就只是組織思想、表達思想和檢查思想。我認為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

形式邏輯能不能“把思維內容確定地、不矛盾地、有條理地組織起來和表達出來”呢？回答是肯定的。形式邏輯的作用是否只是如此呢？回答是否定的。

在前面，曾提到形式邏輯既有證明的作用，又有認識的作用。所謂“證明作用”，一指表達思想，一指論證思想。王忍之同志所說的組織思想和表達思想，並不包括論證思想的意思。事實上，形式邏輯在論證思想方面所起的作用，相對地說，比表達思想要大。比如，“證明與反駁”是形式邏輯的重要內容，我們掌握證明的理論，正確地運用證明的方法、反駁的方法，就能夠在證明真理、駁斥謬誤時增加思想的邏輯性和說服力。特別是在階級鬥爭中，邏輯工具的作用是很明顯的。形式邏輯在這些方面所起的作用，就不能僅僅歸結為組織思想和表達思想。

形式邏輯是能幫助人們獲得新知識的。為了獲得新知，達到真理，在進行推理時，形式邏輯決不是置前提於不問，雖然依靠形式邏輯並不能判明推理前提內容是否真實，但是形式邏輯卻必須過問前提內容，要求前提真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應當承認形式邏輯是要管前提內容的真假的。否則，如果根本不問前提如何，便據以為推，是不可能達到真理的，是和形式邏輯這門科學的本性——為真理服務不相符合的。



关于形式邏輯对象和作用問題的討論

《紅旗》今年第七期发表了王忍之《論形式邏輯的对象和作用》一文后，引起了邏輯学界对于形式邏輯問題的进一步的討論。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先后召开了座談会。《文汇报》、《光明日报》和《数学与研究》等也刊登了討論文章。从目前討論的情况看，对王忍之的文章大致有两种意見：一种意見是，同意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但对其中有些問題还有不同的看法；另一种意見是，根本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或基本上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而只是在个别問題上表示同意。

在討論中，有些同志，例如金岳霖，认为王忍之在文章中对下面几个問題的分析是正确的，这些問題是：肯定形式邏輯是一門科学，这門科学对于表述、論证、探求、验证知識的眞理性說来，是必要的、有用的；思維形式和思維內容是矛盾的統一，思維形式有相对独立性，錯誤的思維內容可以具有正确的思維形式；单独依靠形式邏輯本身不能駁倒一切具有錯誤內容的思想。^① 溫公頤也认为，王忍之所說的，形式邏輯“不研究思維的具体內容，形式和內容是統一而不可分割的，但不妨从这統一体中抽出它的形式作为单独研究的对象，形式邏輯正是作这种研究的科学”，这些都是正确的。^②

在討論中，在有些已发表的文章中，对王忍之文章提出不同的意見，大致有下面这一些：

王忍之认为，“形式邏輯所研究的問題，相对于思維內容來說，乃是形式方面的問題，它研究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揭示思維形式結構的規律。”^③ 馬特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④ 馬特說：“研究思維形式的不仅有形式邏輯，同时还有数理邏輯和辯证邏輯。”“数理邏輯是从思維形式量的側面去研究思維形式”，就是把概念、判断、推理抽象成为用符号表示的公式和公式与公式之間的形式結構的关系。“辯证邏輯是从思維形式

的运动方面去研究思維形式。”馬特认为，形式邏輯实质上是一种“普通邏輯”，它所研究的思維形式，就是已經“形成了的抽象的固定范疇”，而这种思維形式“是以事物最普通、最常見的关系和特性作为它的客观根据的”。他說，如果研究思維形式的只限于形式邏輯这一門科学，那就会“取消数理邏輯和辯证邏輯存在的权利”。

形式邏輯这門科学包括不包括归纳邏輯，包括不包括充足理由律，是邏輯学界爭論的一个問題。王忍之的文章沒有涉及到这个問題。很多同志对此提出了意見。他們认为，归纳邏輯和充足理由律都是形式邏輯的对象；根据这种观点，他們以为，王忍之对形式邏輯对象的說法，是不全面的。馬特說，“普通邏輯”所研究的抽象、分析、綜合、实验等是邏輯方法，而不是思維形式結構。充足理由律也不完全是思維形式結構的規律。归纳推理虽然有形式結構，但归纳方法却是一种邏輯方法。馬特說，按照王忍之的說法，形式邏輯是研究思維形式結構及其規律的科学，就会把上述邏輯方法、充足理由律、归纳等排除在“普通邏輯”这門科学之外。金岳霖认为，形式邏輯有“狭义的”形式邏輯和“广义的”形式邏輯。所謂“狭义的”形式邏輯，就是演繹邏輯；所謂“广义的”形式邏輯，就是既包括演繹邏輯，又包括归纳邏輯。金岳霖說，从“广义的”形式邏輯看

① 《讀王忍之文章之后》，見1961年7月8日《光明日报》，以下所介紹的金岳霖的意見，均引自此文。

② 《研究思維形式能够完全撇开思維內容嗎？》見1961年7月9日《光明日报》，以下所介紹的溫公頤的意見，均引自此文。

③ 見《紅旗》杂志1961年第7期。

④ 見馬特《形式邏輯的对象和作用》一文，該文将于《哲学研究》1961年第4期发表，以下所介紹馬特的意見，均引自該文。



来，王忍之所說的形式邏輯的对象，只包括概念、判断、推理，而沒有提到歸納和充足理由律，这是錯誤的。他还說，如果王忍之所說的形式邏輯的对象，包括了歸納，那么按照王忍之对形式邏輯的对象的说法，也“只是演繹地看待歸納的形式邏輯”，这也是錯誤的。黃順基也认为，王忍之对形式邏輯对象的想法，只較适合于亞里士多德的演繹邏輯，而对于現在的形式邏輯說来，就远远不够的了，現在的形式邏輯应当包括歸納邏輯等。^①总之，他們都认为，王忍之所說的形式邏輯是研究思維形式結構及其規律的科学，这种說法，对于現在的包括歸納邏輯和充足理由律在內的形式邏輯說来，是不全面的，这种說法只是适合于演繹推理的范围，或演繹邏輯的范围。

形式邏輯的对象是思維形式結構，一般都承认这对判断、推理来说是适合的。但这种說法是否同样适合于概念，这就涉及到概念是否也有形式結構的問題。討論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見。一种意見认为，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也可以說是概念的形式結構，因此，王忍之关于形式邏輯对象的说法，对概念也是适合的。另一种意見則认为，概念本身不存在形式結構的問題。持有这种看法的同志认为，王忍之的說法不适合于概念。

在形式邏輯的对象問題上，什么是演繹推理形式，也有不同的看法。王忍之說，金岳霖“他們以为要判定一个推理形式是不是正确，乃至它算不算推理形式，单对推理形式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看这个推理形式和怎样的内容相結合”。金岳霖认为，王忍之这种批評是沒有根据的。他說，推理形式和蘊涵是有重大区别的。推理形式即“所以”，它断定前提内容正确，“并且通过前提的断定过渡到断定結論”；蘊涵即“如果——那么”，它并不断定前件内容和后件内容的正确。金岳霖說，王忍之却“沒有理会这一点”，把蘊涵当作推理形式来“处理”了，这种批評“就針鋒不相对”。

关于形式邏輯对象的討論，还涉及到“思維形式”、“思維形式結構”是否同一概念的問題。不少同志认为“思維形式”和“思維形式結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王忍之在文章中却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作为同一概念来使用了。馬特、黃順基等认为，思維形式結構是用符号表达的公式，它只是思維形式的一个方面，思維形式和思維形式結構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不完全相同的。

王忍之在他的文章中說，形式邏輯是研究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揭示思維形式結構的規律，它不研究思維的具体内容，而只是把思維形式从大量的思維材料中抽取出来进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說，形式邏輯是暂时撇开具体思維内容，在純粹状态中研究思維形式及其关系，这样才能認識思維形式的种种类型，認識它們的本质、規律。王忍之又說，如何研究思維形式結構及其規律，那就必須“研究其内容已被实践证明的思維材料，考察其中的内容是以怎样的方式构造起来的”。在討論中，不少同志都不同意王忍之的上述說法：“为要在純粹状态中研究思維形式及其关系，那就要暂时使它們脱离其具体内容，把内容放置在一边作为不相干的东西。”他們說，形式邏輯研究思維形式不能完全脱离思維内容，必須“联系”、“結合”、“考虑”思維内容，并认为必須結合各門科学来研究，这样才能概括出新的思維形式，不断丰富这門科学的内容。馬特提出，在純粹状态中研究思維形式，只适用于数理邏輯，而不适用于形式邏輯。李世繁认为，必須結合思維具体内容来研究思維形式。^②有些同志认为，不联系思維内容，就不能判断推理形式是否正确。溫公頤說，思維形式既然是反映客观对象而有一定内容的，“所以关于思維形式的研究就不能完全抛开思維内容，完全抛开思維内容就无从断定思維形式本身的正确”。例如：“物质是不灭的，毛呢是物质，所以毛呢是不灭的。”他說，如果不联系思維内容，怎么能知道这一具体推理是犯了“四名詞”的錯誤呢？

有些同志认为，思維形式就是指推理中的三个概念之間所表現出来的种类包含关系，这种包含关系必須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包含关系。徐怀启說，

^① 見《从历史、现状和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的指示看形式邏輯的对象問題》，1961年7月12日《光明日报》。

^② 見1961年6月18日《光明日报》第1版。



“如果一个前提是不真实的,不仅这一个前提里的种类包含关系不可能是正确的,整个推理的种类包含关系也不是正确的。既然‘所有的英雄人物都是上应天象的’这个大前提是不真实的,那么,不仅这个前提里的种类包含关系不可能是正确的,‘岳飞是个英雄人物’这个小前提里的种类包含关系也不可能是正确的,从而‘岳飞是上界星宿下凡’这个結論里的种类包含关系也不可能是正确的,于是,这整个推理的种类包含关系都不可能是正确的。”^①徐怀启认为,这种推理就不能认为是合乎形式邏輯的,因为形式邏輯不仅要求前提和結論前后一贯,不自相矛盾,而且还要求前提內容必須正确。

由于人們对形式邏輯的对象持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对形式邏輯这門科学究竟起怎样的作用,也有不同的看法。王忍之认为,如果說形式邏輯“要求”推理前提內容正确,还很难說得上“管得到”推理內容是否正确。人們在进行推理时,总是自以为从正确的前提出发的,但实际上,“人們对正确的标准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而且許多推理所依据的前提其实是錯誤的。”不少同志強調提出,形式邏輯这門科学要求推理的前提必須是正确的。他們所依据的是充足理由律,认为充足理由律必須要求前提是正确的。馬特认为,根据形式邏輯这門科学的本性,必須“要求前提判断是經過证明的有充分根据的判断”。有些同志认为,前提內容錯誤的推理尽管其推理形式是正确的,而且这种推理形式的正确是应当承认的,但这种推理仍然是不合形式邏輯的。金岳霖說,“如果一个人把AAA运用到违背了充足理由的思想內容上去的話,AAA虽不因此就不正确,然而他的普通形式邏輯仍然是不正确的。”李世繁认为,形式邏輯“管”前提的正确,就是能“断定、判明”推理前提內容的正确。^②馬玉珂提出三段論的規則应当增加“前提必須真实”一条。^③不少同志还认为,王忍之在文章中只談到演繹推理在表述、論证、探求、驗證知識的真理性方面的作用,就整个形式邏輯这門科学來說,只是这一点还是不够的。馬特认为,演繹推理所起的認識作用,仅仅是形式邏輯的一个部分,形式邏輯的認識作用还通过“归纳推理、类比推理以及分析和綜合、抽象和概括、

假設和实验等等邏輯方法而实现”。

什么是形式邏輯对象和作用問題上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馬特认为,人們“在运用思維形式进行推理活动时,就不能不考虑到据以出发的前提的真假”,“否則,推理活动就不是認識真理和证明真理,而只是作符号构造和概念游戏”。黃順基认为,从形式邏輯的“科学的证明”說来,要求推理形式結構的正确,也要求推理的前提、結論的內容正确。不承认这一点,就是把“推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过分的夸大了,絕對化了”。他认为王忍之所說的形式邏輯承认一个推理虽然其前提、結論的內容錯誤,但是只要其形式結構正确,这个推理就是合乎形式邏輯的,这就是說,形式邏輯只是研究推理形式的正确,这个观点实质上就是現代邏輯实证主义的观点。可以看出,什么是形式邏輯对象和作用問題上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人們的認識还是不一致的。

除上述問題外,討論中还涉及到推理形式有无階級性的問題。王忍之认为,推理形式是沒有階級性的,他說:“金岳霖同志认为,同样的一个推理形式,当它和无产階級的思想內容相結合的时候,它才是推理形式,当它和資产階級的思想內容相結合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推理形式了”。王忍之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金岳霖不同意王忍之的批評。他說,不同的階級是“根据不同的階級根源和認識根源”来进行判断,因而就“沒有共同的推理形式”,共同的形式是蘊涵。金岳霖說,王忍之却混淆了蘊涵和推理形式的区别,把蘊涵看作为推理形式,“这是我无法同意的”。

討論正在繼續深入。不少同志正在写文章。有些同志对于討論中提出的問題,如充足理由律、归纳邏輯是否屬於形式邏輯的对象,概念有无形式結構,推理形式有无階級性,等等,表示有兴趣研究。討論将有助于形式邏輯科学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洛文輯)

① 《思維形式的“內容”和思維形式的“形式”》,1961年6月2日《文汇报》。

② 見1961年6月18日《光明日报》第1版。

③ 見1961年6月29日《北京日报》第2版。

